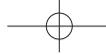


中国的颜色

中国的颜色

【法】布鲁诺·巴贝 BRUNO BARBEY 摄  
【法】尚陆 JEAN LOH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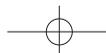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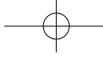
# 中国的颜色



[法] 布鲁诺·巴贝 BRUNO BARBEY 摄  
[法] 尚陆 JEAN LOH 编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颜色 / (法) 布鲁诺·巴贝摄 ; (法) 尚陆编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9.3  
 ISBN 978-7-5596-2900-5  
 I . ①中… II . ①布… ②尚… III . ①摄影集—法国—现代 IV .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180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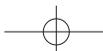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的颜色

摄影 : [法] 布鲁诺·巴贝 (Bruno Barbey)  
 编者 : [法] 尚陆 (Jean Loh)  
 选题策划 :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编辑统筹 : 蒋天飞  
 特约编辑 : 尚 达  
 责任编辑 : 杨芳云  
 营销推广 : ONEBOOK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韩 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9 千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2 38 印张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900-5  
 定价 : 680.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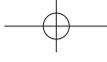




## 目录

布鲁诺·巴贝的中国红 / 中国蓝	4
布鲁诺·巴贝的本色中国	11
<b>1973—1989</b>	13
北京 1973   1980	
上海 1973   1980	
南京 1973	
大同 1973	
苏州 1973	
杭州 1973	
无锡 1973	
成都 1980	
重庆 1980	
灌县 1980	
乐山 1980	
万县 1980	
长寿县 1980	
阳朔 1980	
桂林 1980	
兴安 1980	
澳门 1987	
喀什 1989	
<b>2010—2018</b>	379
香港 2008   2016   2017	
上海 2010   2012	
库布齐沙漠 2012	
大理 2013	
昆明 2013	
青岛 2015	
深圳 2016   2017   2018	
平遥 2016	
北京 2017	
出版书籍   展览   部分永久收藏   影片   摄影师简介	446
致谢	456





## 布鲁诺·巴贝的中国红 / 中国蓝

来拍摄中国的西方人当中，很少有像布鲁诺·巴贝这样的摄影师真正走进中国的。在过去的这六十年中，有许多西方摄影师拍过中国。有些只是为了单程旅行任务，有些是来拍长期性的报道，甚至是驻地项目。这其中包括了巴贝所在的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最杰出的前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38年2月16日至9月22日拍摄过中日战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来到北京和上海见证中国的政权更换（布列松在1954年出版《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sup>[1]</sup>，由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为其写序言）；马克·吕布（Marc Riboud），第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来拍摄的西方摄影师，在1957年“百花齐放”、1965年和1971年进行了三次历史性访问。

这三位大师都以拍摄黑白照片而著名。当时中国官方摄影记者的纪实影像也往往是黑白的。这就说明为什么首次看到布鲁诺·巴贝图片的中国观众特别激动，因为他们对新中国建国初期三十年的视觉记忆大部分是黑白的，而巴贝展示给大家的是色彩鲜明的中国！看起来就有一种“这是昨天的中国”的感觉。

另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巴贝的中国并不像报道摄影或调查任务，而是看起来像一部公路电影，就好像他正在寻找“什么是中国”的探索之旅。可能有人想知道他追求的目标或主题，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的探索之旅还未完成。巴贝不断来回，因为他迷恋上这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多面孔的国家，他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索。

巴贝的中国就是他选择“看见的”并向我们展示的对象。他眼中的北京、上海、四川和广西截然不同，让我们怀疑这些地方是否属于同一个国家。他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柯达克罗姆反转片已经捕捉到旧时皇城北京的干燥空气，也捕捉到被黄浦江分为浦东浦西的上海的潮湿弄堂。然后我们跟随巴贝深入四川和广西，目睹了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理距离和隐喻距离。

巴贝的确是延续了他的前辈布列松和马克·吕布对拍摄的中立态度，他在接近中国时没有先入之见或偏见，只是在巴黎的法国档案馆阅读了有关中国的文献。1909年到1917年间三度来华的法国汉学家、诗人和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在他的书《出征：真国之旅》<sup>[2]</sup>中描述了他在想象的中国



与现实的中国之间的犹豫，即到底一个法国人该用哪一种语言来面对这个国家和文化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而摄影师巴贝的观点是通过相机的取景器从一个适当的距离，一个中立的角度，用画面来描写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巴贝收集了大量的图片来展示这个万花筒般的中国：古都北京，大都市上海，欧亚混血的澳门，丝绸之路的喀什，时尚摩登的香港，以及新兴中产阶级进行旅游消费的内蒙古、云南和青岛。他的旅程不仅有地理上的跨度，也有1973年到2017年的时空跨度，这对他说来有很大的挑战性。他所看到的80年代的中国，和第一次来访时看到的7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差别。更不要说2010年世博会时的中国和距离今天更近的中国。举个例子：1973年的中国到处都是群众，来欢迎和欢送法国总统的上千学生、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鞍钢宪法》宣传画下的工人等等。1980年的中国已经开始个性化，巴贝让我们看到从群众到家庭成员的身份转变的过程：通过他的一系列婚纱照，我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真的过去了，紧接着到来的是计划生育的年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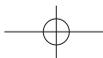
## 歌舞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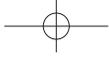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中国是现代国家中的贵族，她有六千年的历史。在最初的两千年间，她的人民是游牧民族和骑马人，而后他们在天子皇权的统治下定居下来，建造了城市，成为农民、士兵、官吏和贵族而安居。”<sup>[1]</sup>1932年荷兰驻中华民国全权大使威廉·托尔贝克（Willem Johan Rudolf Thorbecke，1892—1989）在他夫人艾伦·托尔贝克（Ellen Thorbecke，1902—1973）的中国相簿中写的前言引用了这段文字。艾

伦曾经是德国记者，也是最早的一批女摄影师之一。她为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拍肖像。鹿特丹摄影博物馆收藏了她1931年至1935年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照片拍的是一位十岁的小歌女，身穿一条长长的绒毛旗袍，摆出一个芭蕾舞演员站立在足尖鞋上的姿势，但她的舞鞋的足尖是由木头做的。

1973年巴贝跟随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到北京。这时距离艾伦·托尔贝克离开中国已经四十多年，小歌女已被成千上万的女学生取代。她们排着队站在从机场到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在十公里长的长安街上。为了迎接二十二辆豪华轿车组成的总统车队，小学生们不停地跳着舞，一边欢乐地高喊“热烈欢迎”，一边手上热烈地摇动丝巾和纸花。

在天安门广场前面，巴贝看到一队戴着少先队红领巾、穿着白衬衫的小礼仪队走过，她们花花绿绿的裙子显然是临时定制的。这些小女生边走边转过头来，好奇地盯着在拍照的法国摄影师。她们在记忆隧道的另一端就这么看着我们。这便是巴贝的独特风格之一，在他的大部分照片中，他都能捕捉到至少一个直视他（或者我们）的主体的目光。寻找目光交会的巴贝，在虹桥机场雨中欢送法国总统的人群中，用镜头抓到了一个女孩。透过红丝巾我们看到一张激动的面孔，以及被雨水浸湿的头发。镜头里的这个女孩在她五十多岁时，在2006年6月17日出版的《旧闻周刊》对布鲁诺·巴贝的报道配图里，认出了自己。她设法去法国见巴贝。2016年在巴黎，巴贝亲手向她签赠了这张照片。她现在仍然生活在上海，并清楚地记得欢送法国总统时群众的热情。这种诚挚





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随同蓬皮杜总统来访中国的所有法国记者，令他们至今都难忘，当然也包括布鲁诺·巴贝。

同时吸引巴贝的还有城市居民的种种肢体语言，比如1973年巴贝拍到的南京陆军的演练和上海女民兵的训练，1980年的上海消防队的演习，这些都是难得的机会。当他把镜头转向老百姓，在上海公园、豫园和外滩附近，巴贝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拉伸练腿的居民、打太极练气功的晨练者，还有学校里学生和老师一起做体操的场景。作为一个摄影师，他特别对上海的照相馆有兴趣。1973年他在照相馆外拍橱窗，1980年他干脆大胆地进入南京路、淮海路的摄影工作室。很有可能是他的外国人身份、高大的体格和开朗的状态制造了愉快轻松的气氛，我们看到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新郎和新娘的肢体语言还是富有感情的。我们很想知道三十多年后这几对新婚夫妇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及还有没有机会请巴贝把这些婚纱照送给他们作为纪念。今天的婚纱照已不在照相馆里拍了，巴贝也看到，在上海外滩和外白渡桥上天天都有浪漫的布景。80年代婚纱照的这种味道只能从巴贝的“老”照片里闻到了。

## 从中国红到中国蓝

迎宾女生队伍走过的天安门城楼旁是可容纳上万人的观礼台。这一戏剧性的背景，与一排行进中的女学生叠加在一起构成一个亮眼的舞台。新华门是一个象征现代人民与传统皇权之间接触的地点，它见证了中国与西方之间长期接触和交流的历史，就像1973年9月11日这天的法国总统乔治·

蓬皮杜的正式访问。第一次来到中国，巴贝免不了要去长城和天安门广场。因此有天凌晨，巴贝离开了喧嚣的国事访问，去寻找天安门广场的宁静。在毛主席画像中的温和目光下，只有几辆自行车随意地在没有车流的街道上驶过。两天后，蓬皮杜总统在深夜里被秘密召见，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和伟大舵手私下会面。

从北京到上海，巴贝的镜头记录了北方天空微妙的秋光、前朝的红色土门以及紫禁城墙上的混合物反映出来的色彩。红色和蓝色也可以在那张三个吃冰棒男人的照片里看到：他们坐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布袋子上，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桃红色的“香”字，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他们的冰棒——形成一张构图微妙的经典竖幅图像。

1973年9月，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第八个年头，天安门广场和机场上迎宾女生的花裙子与全国整体的严肃朴素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革命标语和海报仍然随处可见，巴贝背着装有柯达克罗姆反转片的一架尼康相机和一架徕卡相机，一路不断地录制墙上的海报和革命口号。他的纪录片给宣传艺术研究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了足够的一手文献。他拍到的红色宣传画和工农兵的大头像让我们想起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肖像。事实上，当年这些无所不在的宣传海报替代了以前和后来的户外广告，没有这些海报，城市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沉闷和单调乏味。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成都，它们在最困难的时期起到了敦促和鼓励大众的作用，还成就了很多匿名的艺术家，让他们可以去练习画技和发挥才华。像陈逸飞、陈丹青等“文





化大革命”后成名的画家，对于当年在为会员服务时得到的艺术机会，都表达过书面或口头的感谢。还有一张巴贝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展示了排在路旁等待总统车队的上海工人队伍。他们站在一幅庆祝《鞍钢宪法》的巨大的宣传画下面，红色和金黄色的炼钢火焰象征着革命的激情，与穿着蓝布制服、脸上毫无表情的工人的冷色调的安静，产生出一种想象不到的强烈反差。

1980年在成都，巴贝拍到了经典的中国红，就是唐朝诗人杜甫的草堂里一千多年前留下来的红墙。杜甫的诗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最爱吟咏的中国诗，1999年他在巴黎接待中国领导人时，引用了杜甫的《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作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冒险使用彩色胶片做报道的马格南摄影师之一，巴贝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街道上群众的衣着都是深色单调的：工人的深蓝色工服、军人的卡其绿色军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无性别的灰色中山装。在巴贝的视觉日记中，上海豫园湖心亭茶馆里的一片蓝色的老茶客，大多手抱着一壶茶来取暖，蓝色的空气中飘散着一条条白烟雾，有一种时间凝固的平静。外滩的蓝色清晨中，巴贝看到了慢悠悠打拳的太极拳学员，可惜他看不懂背景的中文标语，不然一定能理解那句“争分夺秒奔向2000！”的口号与慢悠悠的太极拳形成的反差中所蕴含的幽默感。在上海某个公园里一对年轻人在谈恋爱，一个抱着孙辈的长者旁放着一辆婴儿车，一个年轻爸爸抱着他已经会站起来的孩子。巴贝可能也不知道这张老中青三代的时代背景是1982

年起实施的计划生育。他们所穿的“中国蓝”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发生后开始成为法国的流行服装。这种从中国进口的非常便宜的蓝染棉布中山装，法语叫“bleu du Chine”，其实在中国就是农民和工人穿的一种蓝色的劳动工作制服。来自大自然的靛蓝染料还有防蚊虫的功效，对农民很有用。在豫园，巴贝还拍到了一个神奇景观——画面左边是一个端着禄来相机为他的模特拍照的专业摄影师，右边是一位倚在“S”形门洞的穿着黄色毛衣的女子，她左手臂挽着一个红色手提包，摆出一个炫耀的姿势。画面左边的摄影师身后还有个正在抽烟的旁观者，这两人也形成了一种黑白影调的皮影戏效果，而在画面右边就是柯达胶卷包装上的标准颜色：黄色与红色。

1980年少年宫里的手风琴班的照片呈现了巴贝的摄影构图手法。他利用教室里随意分散的乐器和乐谱架子，重新组织了由黑白手风琴键盘构成的错落分布的矩形，创造出富有几何感的构图。我们好像还可以听到这些小琴手拉琴箱时发出的音响，还可以欣赏到这些年轻音乐家脸上表现出的高度专注力，包括左上角一个正在专心演奏的小女孩。在巴贝拍完这张照片三十几年后，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在互联网上看到这张照片，并认出了她的女儿。最终她们成功地联系到巴贝。通过他们往来的邮件，我了解到当年的小手风琴家现在已安居美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冬夏两季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之间像候鸟似的迁徙来回。这再次证明了摄影可以抵御时间流逝的力量，以及摄影师作为记忆的守护者的作用。





## 桂林奇妙的美丽绿蓝色

1980年德国《国家地理》杂志邀请巴贝去拍四川。我们随着巴贝远离大城市往内地乡村旅行，看到风景的变化，颜色也在变化。其中他拍到的四川和广西发生了最突出的变化。马克·吕布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的三面红旗》书中的一段话，基本上描述了布鲁诺·巴贝经历的场景。马克说：“有一天，我想毫无目标地随便出去走走，在桂林如此奇妙的美丽绿蓝色的风景里，我沿着小路走了几个小时，穿过村庄和稻田。向导和翻译一直跟在我身后，他们看到我和他们交换了角色，觉得好玩并大笑起来。我们遇到的农民惊讶地看着一个外国人带着两个干部模样的随从。”<sup>[4]</sup>在我们手上这本画册的广西部分中，就可看到巴贝镜头下的桂林真的有“奇妙的美丽绿蓝色的风景”。是什么启发了巴贝往内地去，与那些赶着水牛耕田的农民相遇？我们看到连水牛都有一副类似老道士的悠闲样子。是不是成都的面馆和菜市场里新鲜蔬菜的混合气味，或者是养猪场的刺鼻味道和来自农田的肥料气味，使得巴贝在四川和广西流连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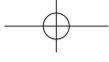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巴贝把田里的小麦、水稻的色彩，和耕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谷整个过程基本上全都拍到了。他还抓拍到上海造船厂的大轮船和附近稻田里忙着低头拔秧的农民妇女这幅没有人拍过的照片。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幅1980年的城市里的农村画面含有丰富的信息，有抗日战争留下的地堡，有70年代工业的老烟筒，最难得的是这些戴防晒头巾的上海农妇让我想起19世纪凡·高（Van Gogh）、高更（Gauguin）、埃米尔·伯纳德（Emile Bernard）笔下的布列塔尼农妇。

巴贝对农民的观察特别有趣，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在他的镜头下是从人力车到高速跑车的一个过程。1980年他在成都城乡接合部见到的都是一系列人拉板车，车上有拉到市场去卖的猪、坐得稳稳的小孩、生病的农民，也有拉去给庄稼囤肥的粪便。1973年离开上海往无锡去，巴贝已经看到在轰轰烈烈的彩色革命电影《奇袭白虎团》和革命戏剧《煤田战歌》的海报下有三架人拉着的人力车。最精彩的是，在成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宣传画下面有几个骑着传统三轮车送货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身后墙上的潜水艇、导弹、战斗机、高速铁路等等今天已纷纷变成现实了。

事实上，这个时空旅行者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从杂技团表演者到川剧演员，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琵琶学生和小提琴手到深圳的吉他手、滑板爱好者，从桂林漓江用鸬鹚捕鱼的渔民到长江上的纤夫，从四川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到传统水墨书法家，从世博会的红色李小龙当代艺术雕像到内蒙古沙漠中身穿白色运动服练瑜伽的女演员，从成都的茶馆到青岛啤酒节的霓虹灯电子派对狂欢者，从桂林乡间的送葬队伍到喀什的阿巴和加麻扎墓的红土——巴贝在往返中国的时空旅程中累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获，都是他自己持续专注的成果。他在按下快门之前的自我克制和对光圈速度的优先选择是基于他对观看和感受的敏锐渴望。可惜这本书放不进那么多精彩的照片。

## 巴贝的可塑性

乔治·蓬皮杜1973年9月14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厅里发言，谈到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共同性和有助于互相理解的几点时，他说道：“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两国的人民都是农民，这点反映了一定的心态，一定的可塑性，一定的耐心；并不总是巴黎人的，但基本上是法国人的，根本就是中国人的。”也许就是这种法国人和中国人共享的农民“可塑性”代表了布鲁诺·巴贝的摄影眼的特点。

2016年，在蓬皮杜总统国事访问的四十三年后，在山西平遥摄影节的开幕式上，巴贝再次看到了载歌载舞的小女生。巴贝心中有着激动的心情，因为这些小女孩让他想起了北京机场、天安门广场和上海机场欢迎送法国总统的热情。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将为来访贵宾举行迎宾仪式变成了一种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仪式，也成了一种表演制度。这次在平遥，在她们的歌舞表演结束后，那些不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女生们背对观众，冲向舞台后方，仿佛想表达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引领世界，是中国的小女生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而不是她们跟着西方摄影人走“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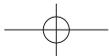
在这本有三百多幅图片，如同百科全书的画册中，很少有一张没有人存在的照片——巴贝对静物或纯景观不是很感兴趣。其实他真的特别关心男女老幼——茶馆里带着满足微笑的老茶客，在昏暗的农村家中很安静的老婆婆，在成都留着长长白胡子操作水泵给居民分配自来水的老爷爷，一屁股坐在乐山大佛脚趾上的孤独沉思者……

还有一张独特的肖像脱颖而出，就是1980年巴贝在上

海武康路拍到的巴金的照片。巴金是2005年逝世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27年至1928年曾在法国小城蒂耶里堡写作他的短篇小说，曾经多年活跃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中。就像杭州西湖游船上周总理的独特肖像一样，巴贝对巴金显露出他在描绘伟大人物时的人文情怀。尽管他在宁静的庭院里、柔和的秋日阳光下与巴金进行了对话，但是那些对话一定是像落叶一样被风吹走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巴金和巴贝两人说了什么，至少他们两人都有以“巴”字开头的名字。

在总结回顾这个丰富的视觉交响曲时，我们发现巴贝的真实国度之旅的确穿越了一个多彩的国度。巴贝不仅看到改革开放前（1973年）的中国，还有改革开放关键时刻（1980年）的中国，然后他又等到上海举办世博会时（2010年）才回来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繁荣、现代化、小康的社会。1986年他选择去拍澳门。四百多年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拜见明朝万历皇帝之前，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学习的汉语。进入中国后利玛窦感叹：“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巴贝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巴贝去澳门之前也追溯过利玛窦走过的路，他去了印度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澳门和利玛窦都见证过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最早的缘分。1989年巴贝选择去新疆喀什，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地标及其文化跟他的出生地摩洛哥一样，对于他说很有亲切感。他常常把摩洛哥比喻为画家最喜爱的场景，因此巴贝对喀什红土地的颜色也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情感。

完全不同于他以往著名的“意大利人”“波兰”“伊朗”“摩





洛哥”（非斯和索维拉）、“葡萄牙”或是他的“阿曼”系列，甚至他的回顾集《布鲁诺·巴贝在路上》和纪念“五月风暴”50周年的新书《在五月风暴的中心》，这样一本书是布鲁诺·巴贝从未出版过的——《中国的颜色》是对这个国度和她的老百姓跨越四十多年的观察和关注，是他耐心熬熟的拍摄结果。当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或者说拍完他的最后一幅画面，因为他着迷的是一直令他吃惊的中国的持续改变。最后，布鲁诺·巴贝在中国到底一直追寻的是什么？是一个精神？一个灵魂？一个国情？

尚陆

注释：

- [1] Henri Cartier-Bresson, *D'une Chine à l'autre*, Les Éditions Delpire, 1954.
- [2] Victor Segalen, *Équipée: Voyage au Pays du Réel*, Les Éditions Gallimard, 1983.
- [3] Ellen Thorbecke, *People in China*, George G Harrap, 1935.
- [4] Marc Riboud, *Les Trois Bannières de la Chine*, Les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65.



## 布鲁诺·巴贝的本色中国

喜欢摄影的人，都会记得罗兰·巴特《明室》(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的开头：“有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是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的（摄于1852年）。我感到很惊奇，当时想的是：我看到的是——一双见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

我第一次见到布鲁诺·巴贝的时候，是同样的惊奇：眼前是一双见过周恩来、江青的眼睛。尤其是，他还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让我也见到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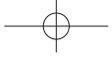
在中国，由于这样的惊奇而对布鲁诺·巴贝感兴趣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在这个人人都是摄影者的时代，任何人赶上任何独特的事件，发到社交网络上，一定会引来无数点赞。见证，成了摄影足以傲视其他种类的特点。我们没有忘记，罗兰·巴特提到热罗姆的眼睛见过皇帝，进而感到惊奇，就出现在题为“摄影的特性”的章节中。见过，是摄影的特性。

然而，仅仅将巴贝定义为一个见证了我们自己都未必亲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外国摄影师，一定会让他深深地失望。也许，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在中国，巴贝见到了什么？

他又怎样呈现出来？

我并非摄影专家，却非常幸运，因各种机缘巧合而遇上过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法国大摄影师，并与他们有过私下交谈：卡蒂埃-布列松、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马克·吕布。这三位大师如今均已作古。他们有关中国的作品，大多以黑白为主。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往往能抓住一些东西，让人觉得那是真正属于中国的，是本质性的东西。比如，马克·吕布镜头下的黄山。

巴贝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人人皆以黑白为影像的主要呈现手段的年代里，大胆使用了彩色。人们知道，为此，他不计代价，不惜人工，在传递方式还非常传统、古老的时代，保证冲印出不变色、不损坏的胶片。我本人有过一个奇特的经历。在年轻未出国之前，我对色彩一直不敏感，直到有一天，初至巴黎的我在圣日耳曼区的布西广场，见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蔬菜和水果。当时的感觉有点像习惯了单调、灰暗的眼睛，突然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仿佛全世界的色彩一下子纷呈在了眼前。在那一霎那的时间里，我甚至明白了《十日谈》中的一些细节，明白了文艺复兴的意义。



巴贝的摄影，让我见到了——或者说重新见到了——我童年时期中国的真实色彩。就好比，人们以前总是说，中世纪是黑暗的，而当我们有幸看到一些中世纪书稿中珍贵的彩图插页，我们突然发现，中世纪是有色彩的，有时甚至是色彩绚丽的。布鲁诺·巴贝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他试图抓住的，不是中国的本质，而是中国的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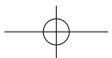
现当代的中国，作为时空，是可以非常令人困惑、不知所从的。对于国人如此，对于外国人更是如此。当你既非历史学家，又非汉学家，你眼中所看到的，何以能够成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影像？布鲁诺·巴贝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有三个解决办法：一，尽量在中国久留；二，在中国各地旅行；三，隔一段时间，就再来中国。于是，他有了与我有幸见过的其他几位摄影师不太一样的经验。他呈现的中国，因其本色，拥有了一种难能的贴近事实的真实，并因不求本质，但求本色而抓住了时代的变迁。从20世纪70年代最早一批相片中出现的几乎统一的色彩，到最新作品中出现的难以调解、难以和谐化的杂乱色彩，中国一次次呈现出它“此时此地”的本来面貌：从表面的一致性到真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某种“本质主义”，到不断变化中的未知和不确定。

这在人们的眼神中也可以看到。巴贝对这种目光十分敏感。早期作品中，相片上人物目光那种明显的聚合，让位给最新作品中人物目光的散乱和各自为营。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在大街小巷，在室内室外，在任何一个角落展现出来。你可以称之为人们之间的漠然、无动于衷，也可以视之作为一种个体的解放、个性的张扬，乃至个体的自由。既可以视为从集体主义的解脱，也可以看作是集体溃散后的流放。

于是，这位谦逊的外来人，以他对世界特有的好奇和敏感，从他令人羡慕的“特许”见证人身份出发，以每一次在中国的表象世界中的“潜水”式游历，抓住了中国的本色，并将这本色呈现出来。作为名副其实的摄影大师，他超越了林林总总幸运猎奇的摄影者，不仅充实、改变了我们的记忆，更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一分子。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幸运：这双如流动的镜子一般穿越世界的纯真之眼，几次抵达中国，既记录下我们彩色的过去，更折射出我们的多样、迷茫和希望。

董强

2018年夏日于鸣鹤园



Bruno Barbey : La Chine aux couleurs du temps

Ceux qui aiment la photographie se souviendront toujours du début de la *Chambre claire* de Roland Barthes : « Un jour, il y a longtemps, j'ai vu une photo du plus jeune frère de Napoléon, Jérôme (photo prise en 1852). J'ai été étonné. Ce que je pensais à ce moment-là était: j'ai vu une paire d'yeux qui avaient vu l'empereur Napoléon! ... »

Quand j'ai rencontré Bruno Barbey, c'était la même surprise : j'ai vu les yeux de quelqu'un ayant vu Zhou Enlai et Mme Mao. De plus, il les a fixés avec un appareil photo et m'a permis de les voir à mon tour.

En Chine, les gens qui s'intéressent à Bruno Barbey à cause de telles surprises ne doivent pas être en minorité. À notre époque actuelle où tout le monde peut faire des photos, rattraper un événement unique et l'envoy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ttire immédiatement d'innombrables louanges. Témoigner est sans aucun doute la caractéristique de la photographie qui la différencie d'autres genres. Il n'y a pas à rappeler que Roland Barthes a justement mentionné les yeux de Jérôme ayant vu l'empereur et son étonnement dans un chapitre intitulé «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photographie ». J'ai vu : voici la spécificité de la photographie.

Toutefois, définir M. Barbey comme un photographe étranger privilégié, témoin de nos événements historiques que nous chinois nous n'avons pas vécus personnellement, le décevra certainement. Peut-être la question vraiment intéressante est : qu'est-ce qu'il a vu en Chine? Comment l'a-t-il montrée?

Je ne suis pas un expert en photographie, mais j'ai eu une chance inouïe, celle d'avoir rencontré presque tous les grands photographes français ayant un lien avec la Chine, et d'avoir eu des conversations privées avec eux : à part Bruno Barbey, il y a eu Cartier-Bresson, Edouard Boubat, Marc Riboud. Ces trois derniers maîtres sont hélas tous décédés. La plupart de leurs travaux sur la Chine sont principalement en noir et blanc. Leurs meilleures photos saisissent quelque chose qui appartient uniquement à la Chine. Elles montrent la Chine dans ce qu'elle a d'essentiel. Par exemple, les Monts Huangshan sous les objectifs de Marc Riboud.

La grande contribution de Bruno Barbey est l'utilisation audacieuse de la couleur dans le monde des images photographiques, à une époque où tout le monde ou presque utilisait le noir et blanc. On sait que, pour cela, il ne ménageait pas forces, énergies, temps, ni moyens, dans une ère où les moyens de transmission étaient encore très traditionnels et presque archaïques, pour s'assurer que le film ne changeât pas de couleur et ne soit pas endommagé. Personnellement, j'ai vécu une expérience très particulière : avant de quitter la Chine pour la France, j'étais totalement insensible à la couleur. Jusqu'au jour où, arrivé à Paris, sur la place du Buci, dans le quartier Saint-Germain, j'ai vu pour la première fois toutes sortes de légumes et de fruits venus du monde entier. C'était un peu comme si mes yeux habitués au gris et au monotone ont soudainement vu les vraies couleurs du monde. Il me semblait à ce moment-là que toutes les couleurs du monde se sont dévoilées devant moi. C'était un moment miraculeux.

**Les photographies de Bruno Barbey m'ont permis de voir - ou de revoir - les vraies couleurs de la Chine de mon enfance.** Les gens disaient que le Moyen Âge était sombre, pourtant, quand nous sommes assez chanceux pour voir de précieuses illustrations en couleur dans certains manuscrits médiévaux, nous découvrons soudainement que le Moyen Âge avait ses couleurs, qu'il était même multi-couleur. Ce que présente Bruno Barbey est une telle Chine. Ce qu'il essaie de saisir n'est pas *l'essence* de la Chine, mais les *vraies couleurs* de la Chine.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en tant que espace-temps, peut être très déroutante. Cela est vrai pour les Chinois, et en particulier pour les étrangers. Quand on est ni historien ni sinologue, comment s'assurer que ce que vous voyez avec vos yeux peut se hisser au statut de parfaite « image du pays »? Bruno Barbey est très conscient de cela. À cette fin, il a trois solutions: d'abord, essayer de rester en Chine pendant une période assez longue. Deuxièmement, voyager à différents lieux de la Chine. Troisièmement, revenir en Chine après un laps de temps. Ce faisant, il a connu une expérience différente de celles des autres grands photographes que j'ai eu le privilège de rencontrer. La Chine qu'il montre, à cause de ses vraies couleurs, possède une sorte de réalité toute proche des faits. Il a su saisir les changements des temps parce qu'il ne recherchait pas l'essence mais cherchait les vraies couleurs. Et ce sont les couleurs du temps. Des couleurs presque uniformes apparues dans les premières photos des années 1970, aux couleurs diversifiées difficiles à unifier et à harmoniser dans ses derniers travaux, la Chine apparaît pleinement dans ses aspects originels d'« ici et maintenant » : de l'apparente unicité aux diversités et complexités, d'une sorte d'« essentialisme », à une incertitude constante. Cela peut également se constater dans les regards des gens, auxquels M. Barbey est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Une convergence évidente des regards des personnages sur les photos des premiers travaux, a cédé la place aux regards dispersés, divergents et individuels dans les œuvres récentes. Une nouvelle relation se manifeste entre les gens dans les rues, à l'intérieur ou à l'extérieur d'une salle, à n'importe quel coin. Vous pouvez appeler cela l'indifférence entre les personnes ou un égotisme plus prononcé, mais vous pouvez aussi considérer cela comme une libération des individus, la naissance de l'individualité et même de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On peut voir comme une sortie du carcan du collectivisme, tout comme on peut considérer cela comme un exil sans fin après un effondrement collectif...

Ainsi, ce merveilleux voyageur étranger, avec une sensibilité aigüe du monde qui ne tient qu'à lui, a vite dépassé son identité première d'enviable témoin privilégié et a entrepris une véritable « plongée en apnée » dans le monde de l'apparence en Chine. Il a vécu dans les vraies couleurs de la Chine et a su présenter ces couleurs, telles quelles. Elles sont les couleurs du temps. Ce maestro a ainsi surpassé d'innombrables faiseurs de photos qui ont la chance de devenir témoins d'un instant, ne serait-ce précieux et rare. Décidément, nous avons de la chance, car cet homme qui traverse le monde avec ses yeux innocents a bien voulu faire des pauses en Chine, et, avec ses miroirs mouvants qu'il dresse sur le chemin, il a su refléter nos diversités, nos désarrois, et surtout nos espoirs. Sans se contenter d'enrichir et de changer notre mémoire, il est devenu une partie de notre nouvelle ère.

Dong Qiang, à Pékin. Juin 2018.

## Bruno Barbey - du Rouge de Chine au Bleu de Chine

Texte de Jean Loh

Parmi les photographes Occidentaux qui sont venus en Chine, peu sont vraiment entrés au cœur de la Chine comme Bruno Barbey. Au cours des six dernières décennies, ils sont venus nombreux, en effet, certains pour des reportages spécifiques en un seul voyage, d'autres pour des projets à plus long terme, et voire même pour une résidence. Cela inclut les aînés illustres de Bruno Barbey : en particulier Robert Capa, venu en 1938 couvrir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il est resté du 16 Février au 22 Septembre 1938); Henry Cartier-Bresson qui est venu à Beijing et à Shanghai entre décembre 1948 et janvier 1949, en tant que témoin oculaire du changement de régime chinois. (Son livre « D'une Chine à l'Autre » publié en 1956, est préfacé par le philosophe existentialiste Jean-Paul Sartre), Marc Riboud qui est arrivé en 1957 en pleine campagne des « Cent Fleurs », il est le seul photographe occidental à avoir photographié les trois premières décennies de la Nouvelle Chine, durant ses trois visites historiques de 1957, 1965 et 1971.

Cela peut expliquer pourquoi, le public chinois qui vo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photographies de Bruno Barbey est saisi par un sentiment de nostalgie, car la mémoire visuelle collective de la Chine Populaire des trois premières décennies reste marquée par des images en noir et blanc, surtout s'agissant de la photographie documentaire officielle chinoise, alors que le monde chinois que Bruno donne à voir est tout en couleur! On a même l'impression que c'est « la Chine de hier ».

Cette différence majeure vient du fait que la Chine de Bruno Barbey ne ressemble pas à un photoreportage classique, ou à une mission d'enquête, on a plutôt le sentiment d'assister à un road-movie, comme s'il était venu à la recherche d'une certaine identité chinoise, une idée de la Chine. Qu'est-ce que la Chine? Semble-t-il se demander avec émerveillement. Nous aussi on aimerait savoir ce qu'il cherche, une âme chinoise ? Un esprit chinois ? Une chose est certaine, son errance chinoise est loin de toucher à sa fin, car Bruno Barbey ne cesse de partir

pour mieux revenir, comme s'il était devenu fasciné par cette immensité, ce pays aux visages multiples et changeants, aux mille découvertes, il sait bien qu'il a besoin d'aller plus loin et d'explorer encore plus en profondeur.

En réalité, la Chine de Bruno Barbey c'est ce qu'il a choisi de "voir" et de nous montrer. Pékin, Shanghai, Sichuan et Guangxi à ses yeux sont aussi différents et distincts les uns des autres, on en arrive à se demander si ces lieux appartiennent à un même pays. Ses films Kodachrome de 1973 et de 1980 ont absorbé la sécheresse rouge ocre du vieux Pékin impérial apporté par le vent qui vient du désert de Gobi, mais aussi la langueur humide des Lilongs de Shanghai émanant des rives du Fleuve Pu qui sépare la métropole en Pudong (Est) et Puxi (Ouest). Mais si nous décidons de suivre les pas de Bruno Barbey vers les terres intérieures du Sichuan et du Guangxi, nous découvrirons avec lui le vert jade des rives du Yangzi et le bleu foncé des dédales dans les villages de Guilin...les distances géographiques et métaphoriques qui séparent les métropoles urbaines des campagnes rurales de la Chine.

Si son habileté à voir n'a d'égale que sa curiosité pour toute chose chinoise, Bruno Barbey n'en reste pas moins fidèle à sa position d'impartialité et d'objectivité, il aborde la Chine sans idées préconçues et sans préjugés, ses préparatifs consistaient en quelques séances studieuses passées à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du Quai Voltaire. A la différence du sinologue, archéologue, poète et photographe Victor Segalen qui a entrepris trois séjours en Chine entre 1909-1917, l'auteur de « L'équipée : Voyage au Pays du Réel » qui était nourri d'un trop plein d'une Chine imaginaire, avait du mal à trouver le langage pour décrire la duplicité entre réalité quotidienne et romantisme historique. Le langage choisi par Bruno Barbey en revanche c'est la photographie : peindre la Chine telle qu'il voit à travers son viseur avec la lumière de Pékin, la lumière de Shanghai, de Sichuan et de Guangxi, tout en gardant une juste distance. Et ce n'a pas été facile car il s'agit d'un kaléidoscope : Pékin l'impériale, Shanghai la cosmopolite, Macao l'eurasienne, la Route de la Soie de Kashgar, Hong Kong capitale de la

Mode, sans compter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bourgeoisie moyenne assoiffée de divertissements qu'il a observée dans un immense parc de la Mongolie Intérieure qui s'appelle les Dunes Chantantes, ou sur les plages bondées de Qingdao.

Comparée à la Grande Diagonale de Segalen, l'équipée de Bruno Barbey n'a pas été une simple traversée dans l'espace mais c'était aussi une traversée dans le temps, de 1973 à 2018, une véritable gageure. La Chine se métamorphose si vite que le pays de 1980 est déjà bien différente de celui de 1973, la Chine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2010 que Bruno Barbey a photographié avec gourmandise apparaît aujourd'hui un peu délavée comparée avec cette Chine contemporaine sans cesse renouvelée d'aujourd'hui, à l'orée du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Il suffit de donner un exemple: en 1973 Barbey voyait la masse partout, ces milliers d'étudiants, de soldats de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des ouvriers alignés sous la fresque murale des aciéries d'Anshan, venus acclamer la visite d'un Président français. A partir de 1980 l'individu chinois en tant que tel commence à apparaître dans la photographie de Bruno Barbey, mis en avant à travers sa collection de photographies de mariage, nous prenons conscience qu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st définitivement terminée, puis avec la politique du planning familiale est venue l'ère de l'enfant unique.

## La Chine qui chante et qui danse

« La Chine est une aristocratie parmi les nations modernes, elle a une histoire de six mille ans. Au cours des deux premiers millénaires, son peuple était fait de nomades et de cavaliers, puis ils se sont installés, ont construits des cités, et vivaient comme paysans et soldats, princes et mandarins sous le règne de leur empereur Fils du Ciel », écrit en 1932 William Thorbecke l'ambassadeur Plénipotentiaire des Pays-Bas en République de Chine, dans la préface de l'album de photographie chinoise de son épouse Ellen Thorbecke (1902-1972). Ellen, de son nom de jeune fille Catleen, était une photoreporter allemande, l'une des

premières femmes photographes, elle a réalisé surtout des portraits de chinois de tous bords, entre 1931 et 1935, ils sont aujourd'hui visibles dans la collection du Musée de Rotterdam, y compris l'une de ses plus étonnantes photographies, qui représente une « Sing-Song Girl », une appellation de l'époque coloniale, une fillette de dix ans, vêtue d'une longue robe chinoise matelassée, se tenant sur ses pointes comme une ballerine, à la différence près que ses pointes étaient faites d'un bout de bois ficelé à ses pieds.

Lorsque Bruno Barbey débarque à Pékin en 1973, dans la délégation des reporters accompagnant la visite officielle du Président Georges Pompidou, quelque quarante ans après Ellen Thorbecke, les Sing-Song Girls sont remplacées par des milliers d'écolières, massées le long des dix kilomètres de l'avenue Chang'an depuis l'aéroport jusqu'à la place Tiananmen, pour accueillir le cortège présidentiel de cent vingt-deux voitures, elles dansent et chantent avec ferveur des slogans de bienvenue, tout en agitant leurs foulards de soie et des bouquets de fleurs en papier. C'est devant la Porte de la Paix Céleste, que Bruno Barbey voit défiler ces petites hôtesse en chemisier blanc surmonté de l'écharpe rouge des Jeunes Pionniers, elles sont parées de jupes de toutes les couleurs, visiblement confectionnées à l'improviste. Ces écolières tournent leur tête pour fixer directement le photographe, en même temps, elles semblent nous scruter de l'autre bout du tunnel de la mémoire.

On a ici l'un des trait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photographie de Bruno Barbey, qui réussit souvent à capter le regard de ses sujets qui le lui renvoient droit dans les yeux. La recherche du contact visuel avec ses sujets conduit Bruno Barbey, cette fois-ci à l'aéroport de Shanghai, lors des au-revoirs émouvants offerts par Chou Enlai à Pompidou, à saisir dans son viseur cette autre écolière, qui chantait et dansait avec un sourire éclatant à peine dissimulé derrière son foulard de soie, ses cheveux trempés par la pluie. Des années plus tard cette écolière, à la cinquantaine, s'est reconnue dans une photo de Bruno Barbey publiée par un hebdomadaire, le Jiuwen Zhoukan du 17 juin 2006. Elle a tout

faut pour venir à Paris à la rencontre de Bruno Barbey, qui en 2016 lui a dédié cette photo. Aujourd'hui encore elle vit à Shanghai et se souvient avec émotion de l'ardeur de la foule autour du Président Pompidou, malgré une pluie incessante, la scène avait ému tous les journalistes français présents y compris Bruno Barbey. Jean Lefèvre le correspondant de l'ORTF s'est écrié devant la caméra : « Pékin c'est un sourire mais Shanghai c'est le cri du cœur ! Shanghai la plus grande ville de Chine avec 10 Million d'habitants mais c'est la plus troublante dans son ardeur à saluer le président Pompidou ! »

Ce qui attirait Bruno Barbey c'était aussi le langage du corps : de ces chants et danses il alla passer aux entraînements des soldats de la 179<sup>e</sup> division de l'infanterie de Nanjing, aux exercices de tir des miliciennes de Shanghai, aux cascades des pompiers, comme s'il avait voulu rendre hommage à Robert Capa. Dans la rue et dans les jardins il croquait ces shanghaiens qui se livraient à toutes sortes de contorsion pour s'étirer les jambes, ces pratiquants de Qigong et de Taïchi, ou bien ces écoliers et leurs professeurs en gymnastique matinale. En tant que photographe lui-même il était attiré par les vitrines des studios de photographie, dont il prit courage à franchir la porte, pour se retrouver devant une moisson de photos de mariage iconiques. Était-ce en raison de son identité de visiteur étranger, en tous les cas il y régnait une atmosphère de gaieté et d'empathie entre ces couples de jeunes mariés et les photographes de studio cum metteurs en scène. On ne peut s'empêcher d'imaginer plus de trente ans après ce que sont devenus ces jeunes mariés, et si on leur faisait cadeau de ces clichés de Bruno Barbey comme souvenir ? Certes, les choses ont bien changé, les jeunes mariés de Shanghai d'aujourd'hui ne veulent plus être confinés à l'intérieur d'un studio, on les voit prendre des poses dans les parcs, sur le Bund sur le Pont Métallique comme Bruno a pu lui-même constater, pour constituer des souvenirs dans leur album de mariage.

## Du Rouge de Chine au Bleu de Chine

En septembre 1973, la Chine vivait encore dans la huitième année de s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es jupes à motif chatoyant des écolières de la cérémonie d'accueil sur la place Tiananmen et dans les aéroports de Pékin et de Shanghai contrastaient fortement avec l'austérité générale du pays. Comme l'un des premiers photographes à s'aventurer dans la photographie en couleur dans les années 1960 et 1970, Bruno Barbey se souvient d'avoir été frappé par une tonalité quasi monochromatique dans la rue, soit le bleu foncé des ouvriers, soit le vert kaki des militaires ou le gris généralisé du costume Mao unisexe. La place Tiananmen avec son mur monumental dont le balcon peut accueillir jusqu'à 20 000 personnes sert de toile de fond théâtrale superposée à la rangée des écolières en marche. Lieu de contact entre le pouvoir impérial et le peuple, cette porte de la nouvelle Chine (Xinhuamen) est chargée de symboles dont la longue histoire des échanges entre la cour de Chine et les visiteurs de l'Occident, comme ici en ce jour du 11 septembre 1973 pour la visite officiell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George Pompidou.

De son premier contact avec l'Empire du Milieu, Bruno Barbey était tout naturellement attiré par la Grande Muraille et la place Tiananmen. Ainsi, aux premières heures de la journée, loin de l'agitation de la visite d'État, Bruno sortit pour profiter de la quiétude de la place Tiananmen où seuls quelques vélos flânaient oisivement dans les rues désertes sous le regard bienveillant du portrait du président Mao. Deux jours plus tard, à l'insu de la presse, Pompidou sera finalement reçu dans la nuit à un tête-à-tête avec le Timonier lui-même, en toute intimité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sa résidence à l'intérieur de Zhongnanhai.

De Beijing à Shanghai, l'œil de Barbey a donc enregistré la lumière subtile du ciel du nord en automne teintée par les particules du sable du désert de Gobi. C'est un mélange du rouge ocre impérial des portes et des murs de la Cité Interdite. Le rouge et le bleu se retrouvent aussi dans la photo iconique des trois cadres du parti assis sur leurs sacs «Servir le

Peuple», tous trois dégustant leur glace à l'eau sous une énorme enseigne rose dont le caractère signifie «parfumé». L'une des photographi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e Barbey est aussi celle des ouvriers de Shanghai dans leur uniforme bleu (bleu de chauffe) alignés sur le bord de la route juste sous une peinture monumentale célébrant la Constitution des Aciéries d'Anshan, les couleurs chaudes des flammes rouge et or des forges symbolisant la passion révolutionnaire occupant la partie supérieure de l'image, contrastant avec la couleur froide du bleu des uniformes d'ouvriers attendant dans le calme le passage du cortège présidentiel.

En Septembre 1973, la «Grand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 était encore dans sa huitième année, les jupes colorées des écolières de la place Tiananmen contrastent forcément avec le style uniformément austère et dépouillé de l'ensemble du pays, et Bruno Barbey se faisait une joie d'impressionner sur ses pellicules Kodachrome, avec ses appareils Leica et Nikon, les omniprésents slogans révolutionnaires et les grandes affiches murales. Ses photographies auraient donc pu servir de documents aux chercheurs et historiens de l'art de la propagande. Comme la glorification des Gong-Nong-Bing (l'Ouvrier, le Paysan et le Soldat) que Bruno Barbey a vu se matérialiser sur les échafaudages d'une peinture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les trois têtes de Gong-Nong-Bing, nous font penser aux portraits Pop Art d'Andy Warhol. En effet, ces affiches de propagande jouent le rôle d'animation au même titre que des panneaux publicitaires, sans lesquels la vie dans les rues aurait été encore plus terne et monotone. Omniprésentes à Pékin,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Wuxi et Chengdu, les affiches de propagande servent à exhorter la masse chinoise durant ces années difficiles. En même temps elles ont permis aux artistes de continuer à pratiquer leur technique et à développer leur art, certains des peintres de grand renom tels que Chen Yifei et Chen Danqing ont écrit leur reconnaissance pour l'opportunité qui leur était offerte de perfectionner leur art, même si c'était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

Même l'atmosphère semble être passée du rouge au bleu lorsque nous suivons le déplacement photographique de Bruno Barbey de Pékin à Shanghai, alors que les slogans et les affiches révolutionnaires étaient encore répandus en 1973 et en 1980, un certain calme a commencé à apparaître. Dans le pavillon de thé au Yu Garden, ces buveurs de thé attablés se réchauffant la main autour de leur théière à chacun étaient tous vêtus de bleu. Dans le bleu matinal du Bund ces pratiquants de Tai-Chi tout de bleu vêtus, poussaient lentement leurs mains gantées de blancs, devant une affiche géante qui exhortait avec ironie le peuple à « ruer vers l'an 2000, sans perdre une minute ni une seconde ».

Et c'est aussi dans le jardin du Mandarin Yu que Bruno a saisi cette scène magique d'un photographe pointant son Rolleiflex vers une shanghaienne qui surgit d'une ouverture en forme de "S" dans le mur, elle exhibait fièrement son sac à main rouge devant son chandail jaune. Ces deux couleurs le rouge et le jaune, comme par hasard, sont les couleurs identitaires de Kodak.

C'est ensuite en 1980 à Chengdu que Bruno Barbey a photographié le fameux mur rouge (d'un rouge de Chine classique) dans le jardin du Temple de la Chaumière du poète Du Fu. Du Fu de la Dynastie Tang est le poète chinois préféré de l'ancien président français Jacques Chirac.

Assistant à une classe d'accordéon au Palais de l'Enfance de Shanghai Bruno Barbey se sert des claviers noir et blanc accordéon et des rangées de pupitres de partition musicale pour composer un tableau de contrepoint géométrique. Parmi les visages de concentration des enfants la maman de la fillette d'en haut à gauche a contacté Bruno Barbey trente ans après. Cette jeune accordéoniste est aujourd'hui mariée et vit aux Etats Unis entre ses résidences de New York et de Palm Beach. Preuve une fois encore du pouvoir de la photographie à résister au passage du temps en tant que gardienne de la mémoire.

## Magnificence du bleu vert de Guilin

En 1980, Geo Magazine invite Bruno Barbey à photographier la province de Sichuan. En nous éloignant des grandes villes pour nous rendre dans la campagne en compagnie de Bruno Barbey, on voit que le paysage change et les couleurs aussi. Marc Riboud dans son livre paru en 1965 *Les Trois Bannières de la Chine* décrit avec justesse ce qu'a vécu Bruno Barbey en passant du Sichuan au Guangxi. Marc Riboud disait: « Un jour, j'ai voulu juste faire une promenade, sans but, au milieu de ce paysage bleu vert si étrangement beau de Guilin, j'ai marché pendant des heures le long des sentiers à travers les hameaux et les rizières, en trainant derrière moi mon guide et mon interprète, qui se sont mis à rire de voir ce renversement des rôles. Les paysans que nous avons croisés semblaient aussi surpris par la vue de deux cadres du parti avec un étranger. » [4] Dans le chapitre sur le Guangxi de ce livre de Bruno Barbey, on peut en effet admirer ce magnifique paysage bleu - vert à travers l'objectif de Bruno Barbey.

Qu'est-ce qui a poussé Bruno Barbey à s'éloigner des grandes villes pour se plonger dans l'intérieur de la Chine profonde à la rencontre des paysans qui labouraient dans les rizières avec leurs buffles d'eau? Même ces buffles d'eau avaient des airs de vieux sages taoïstes. Est-ce que c'est l'odeur piquante des fermes porcines et ce mélange de l'odeur du fumier et la fraîche senteur des légumes dans les marchés qui faisaient s'attarder Bruno Barbey dans le Sichuan et le Guangxi? Était-ce à la recherche de ce que Segalen appelait « le pays du réel ? » En effet, Barbey a été presque partout et il a vu beaucoup de monde, des acrobates de cirque aux acteurs d'opéra, des étudiants du conservatoire de musique de Shanghai au guitariste sur skateboard de Shenzhen, des pêcheurs aux cormorans de Lijiang aux studios de photographes des mariages, il est allé chez des artistes peintres et des calligraphes, chez un grand écrivain chez les pompiers et jusque dans la cuisine des soldats, il a marché aux côtés de cette paysanne portant deux canards vivants sur son épaule devant une toilette publique rurale, a découvert ce chantier naval de

Shanghai aux bords des champs de culture, il a humé l'ambiance de fête des jeunes chinois nouvellement riches dans des parcs d'attractions de la Mongolie intérieure, et festoyant au festival de bière de Qingdao, il a photographié les enterrements ruraux dans les champs de Guilin et la tombe d'Abba Jamaa à Kashgar, cette impressionnante collection de Bruno Barbey, issue d'un long périple à travers l'espace et le temps, est le résultat de sa nonchalance, et aussi de sa retenue avant d'appuyer sur le déclencheur, conséquence logique de sa priorité donnée à l'ouverture sur la vitesse, témoin de son désir de prendre le temps de voir et de sentir.

## Bruno Barbey et la plasticité

Georges Pompidou dans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prononcée à Pékin 14 Septembre 1973, dans l'une des cent salles de l'immense Congrès du Peuple, a évoqué la similitude entre le peuple chinois et le peuple français, « il y a ce quelque chose qui facilite la compréhension entre les peuples, dit-il, fondamentalement, nous sommes deux peuples paysans, cela reflète un certain état d'esprit, une certaine plasticité, une certaine patience, pas toujours parisienne mais fondamentalement française, et essentiellement chinoise. »

C'est peut-être cette sorte de « plasticité » partagée par les Français et les Chinois, qui caractérise l'œil photographique de Bruno Barbey.

En 2016, plus de quarante ans après la visite d'Etat du Président Pompidou en Chine, lors de l'ouverture du Festival de la photographie de Pingyao, Bruno Barbey semble revoir des écolières danser et chanter en costume de célébration. Il a dû ressentir ce pincement au cœur, car ces petites filles lui rappelaient l'enthousiasme de la foule à l'aéroport de Pékin, à la place Tiananmen et à l'aéroport de Shanghai lors de la visit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La Chine socialiste a transformé ces cérémonies de bienvenue pour les visiteurs VIP en un art, qui n'est pas seulement un rituel, mais c'est devenu aussi un système de performance. A Pingyao, à

la fin de leur spectacles de chant et de danse, ces fillettes tournent le dos au public, et se précipitent vers l'arrière de la scène, comme s'elles veulent signifier que l'époque a changé, que la Chine est désormais le meneur du jeu sur la scène mondiale, ce sont ces écolières chinoises qui nous guident vers l'avenir, au lieu de suivre les occidentaux comme par le passé.

Dans ce catalogue quasi encyclopédique de plus de quatre cent pages, il y a très peu d'images sans présence humaine, cela ne veut pas dire que Bruno Barbey ne s'intéresse pas au paysage ou à la nature morte. En fait, il est essentiellement concerné par les gens, les jeunes et les moins jeunes - comme ce portrait rapproché du soldat qui gardait l'entrée du Palais du Peuple à Pékin, ou de ce vieil homme à la barbe blanche gardien d'une pompe à eau de Chengdu. Dans ce voyage au pays du réel réécrit par Bruno Barbey, il est remarquable que le photographe ait pu réunir la porte d'entrée de la Chine et la porte de sortie ou d'ouverture, la première étant Macao et la dernière c'est Kashgar qui représente la nouvelle « Route de la Soie ». Il y a plus de 400 ans c'est par Macao que Matteo Ricci est entré en Chine. Il disait déjà : la Chine n'est pas seulement un Royaume, la Chine c'est un monde.

Au fond Bruno Barbey c'est ce chinois vêtu de bleu, assis sur le pied du Bouddha Géant de Leshan, perdu en contemplation devant l'immensité et l'énigme de ce monde Chinois dont l'âme reste impénétrable.

Il reste ce très beau portrait rarissime de 1980 à Shanghai, de l'écrivain Ba Jin, dans la cour de sa maison de Wukang Road - Ferguson Lane, du temps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rayonnant de bonheur et de bienveillance. Ba Jin (Pa Kin) est l'un des plus grands écrivains de Chine mort à l'âge de cent ans à Shanghai en 2005, il a achevé d'écrire son premier roman en France à Château-Thierry où il a séjourné pendant 18 mois entre 1927 et 1928, il a été sur la liste des nobélisables de littérature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Bien que Bruno Barbey ait entamé une conversation, certainement en français, avec Ba Jin, dans la quiétude de cette cour baignée par le soleil doux automnal, mais les mots de cette conversation ont dû être emportés par le vent comme les feuil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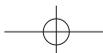
mortes. Nous ne saurons jamais ce que Ba Jin et Barbey se sont dit, au moins tous deux partagent cette similitude de porter un nom commençant par les lettres "Ba".

No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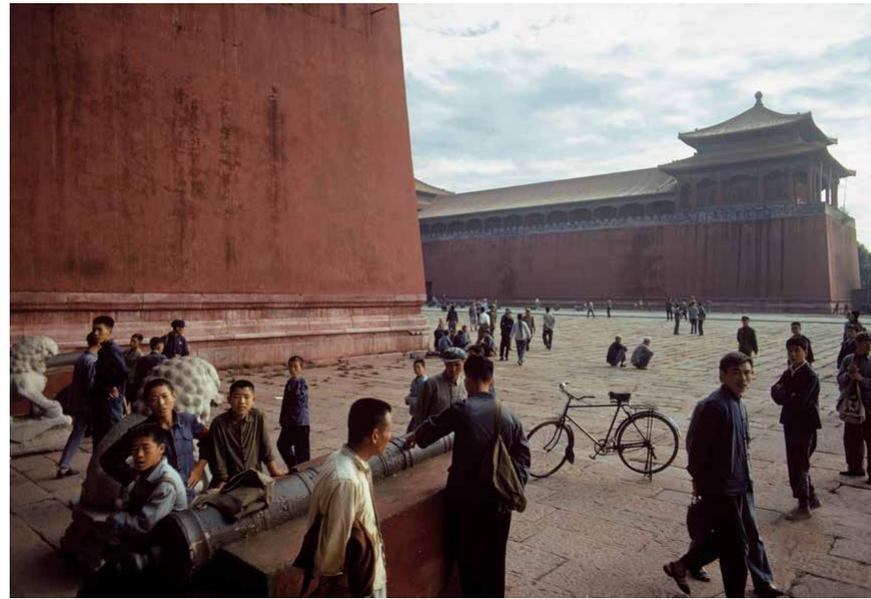
- 1) Henri Cartier-Bresson: *D'une Chine à l'autre*, les éditions Robert Delpire 1954
- 2) Ellen Thorbecke: *People in China, 32 photo studies*, publié par George G Harrap & Co 1935
- 3) Victor Segalen: *Equipée - Voyage au Pays du Réel*, les éditions Gallimard 1983
- 4) Marc Riboud : *Les Trois Bannières de la Chine*, les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65



1973—1989



































奇袭白虎团

无锡市锡剧团演出



无锡市锡剧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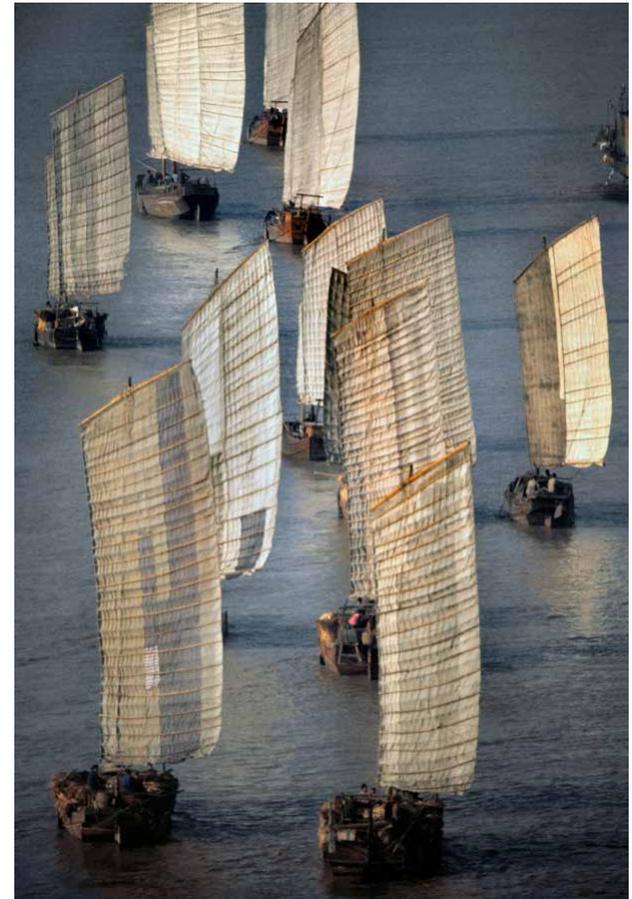
煤田战歌

试验创作演出 革命现代锡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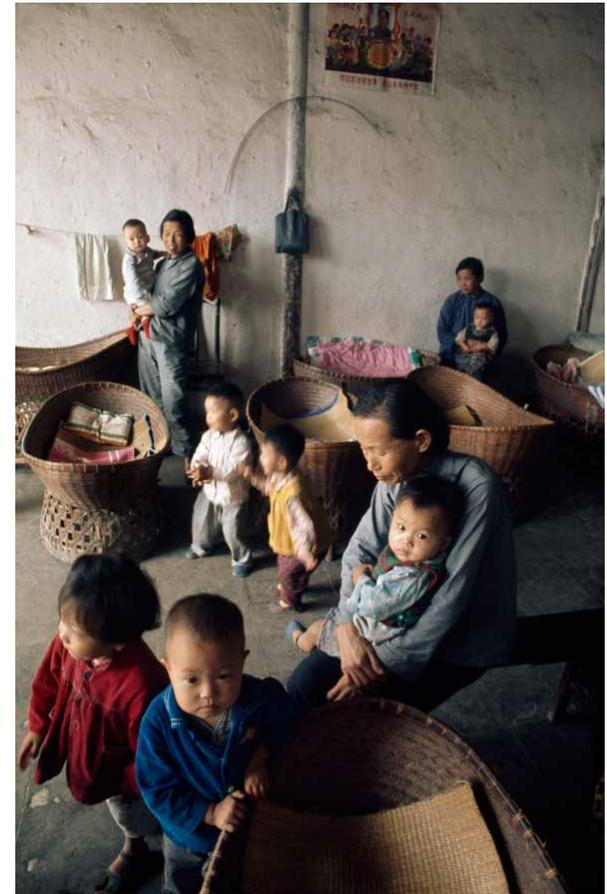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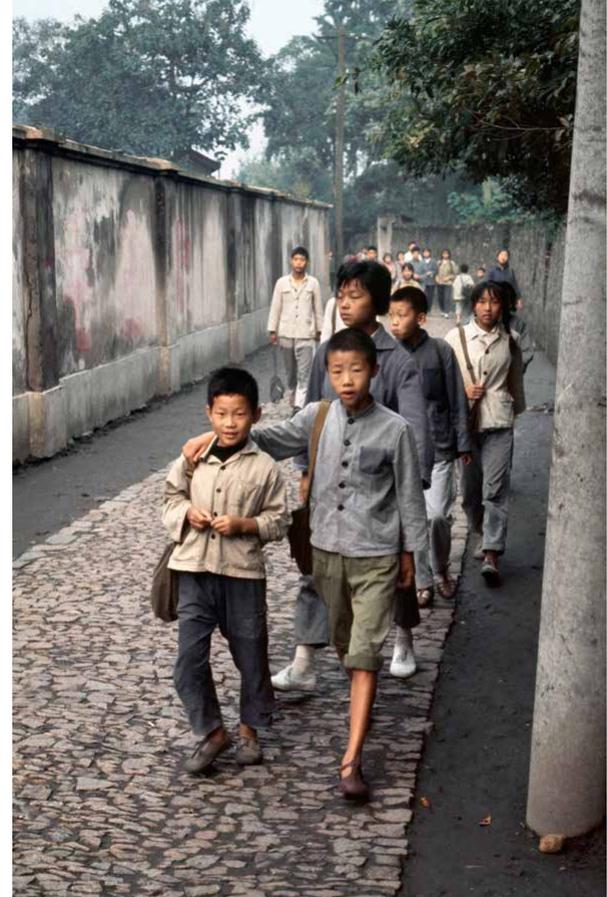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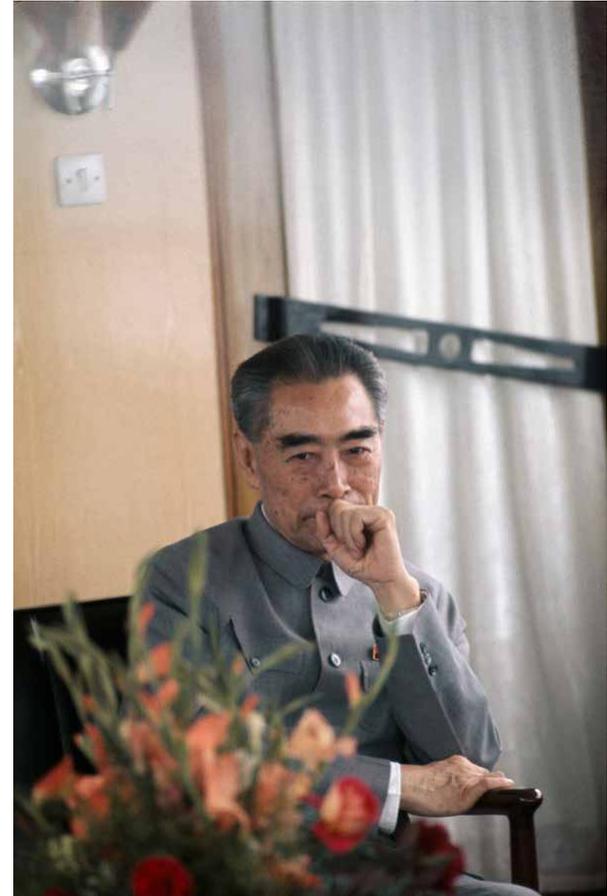






















BRUNO BARBEY CHINA IN BLUE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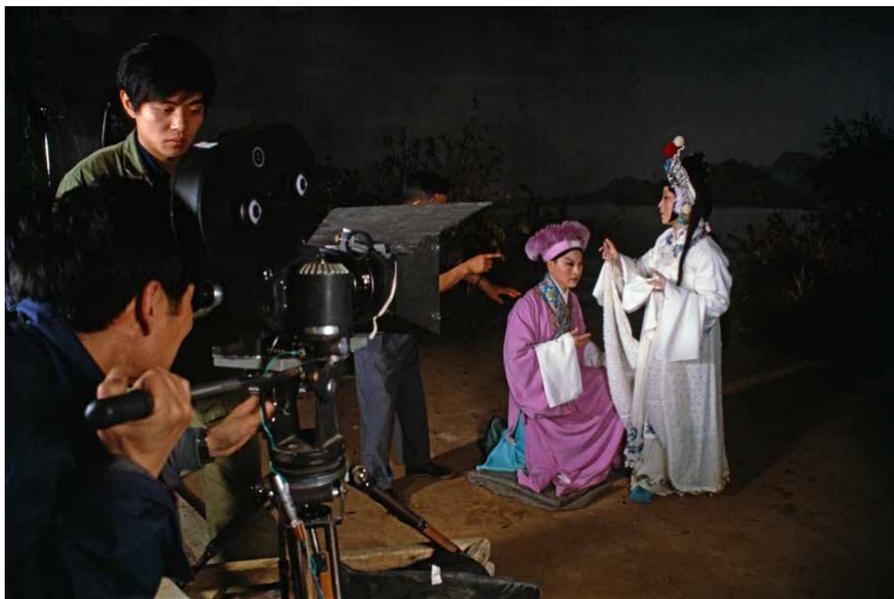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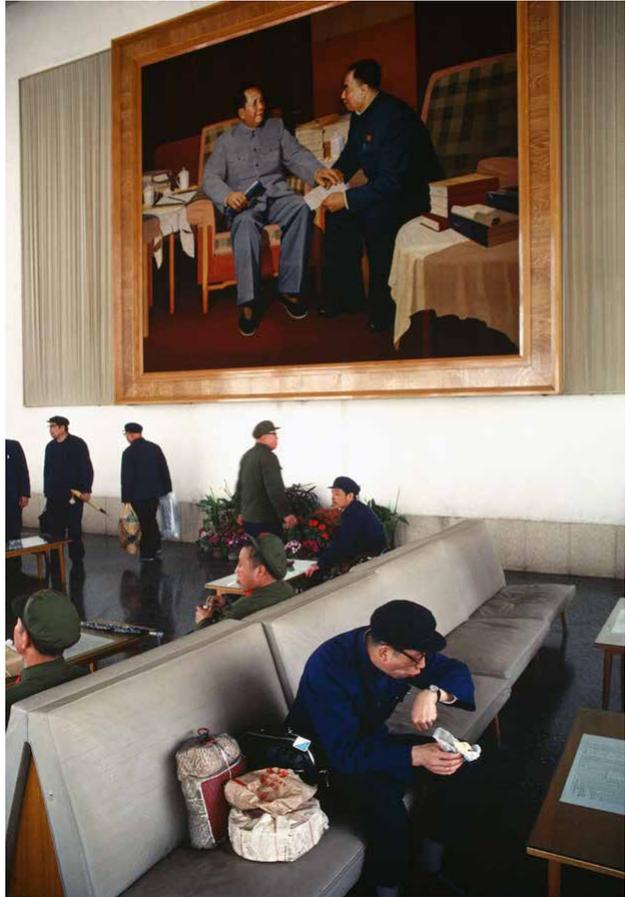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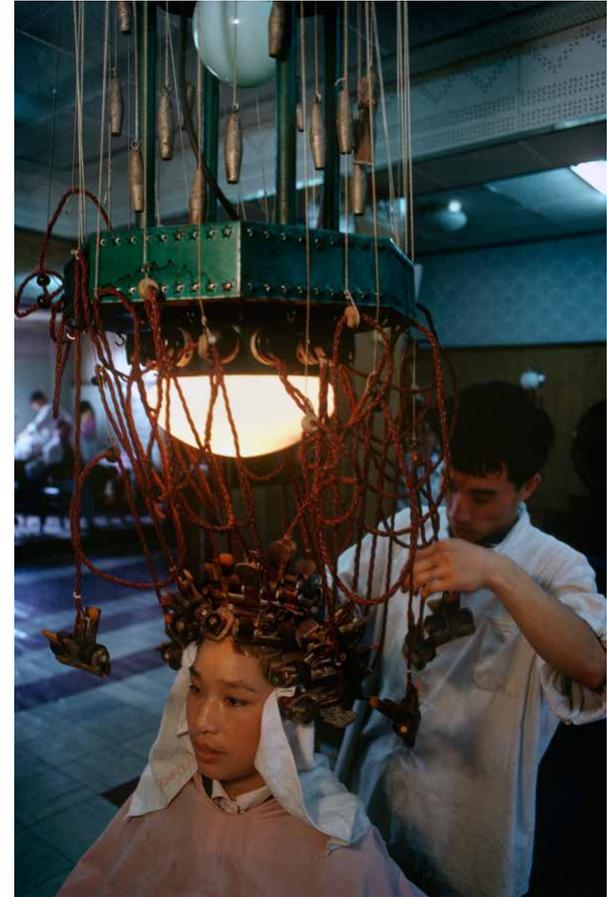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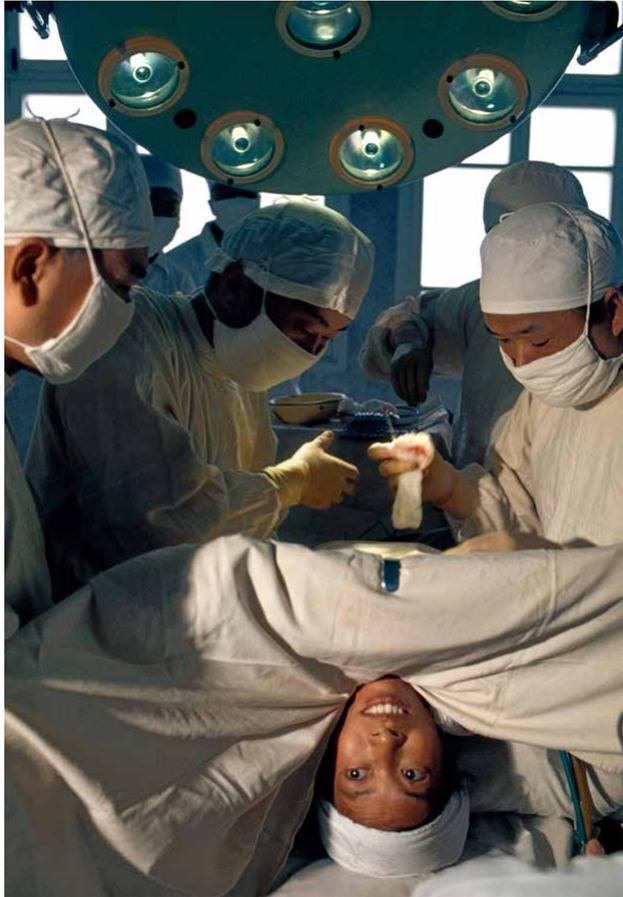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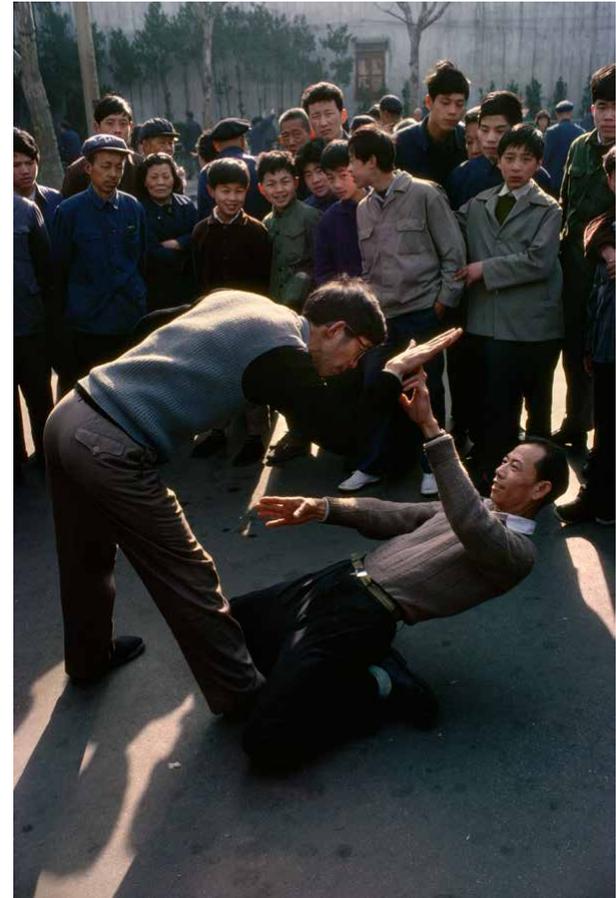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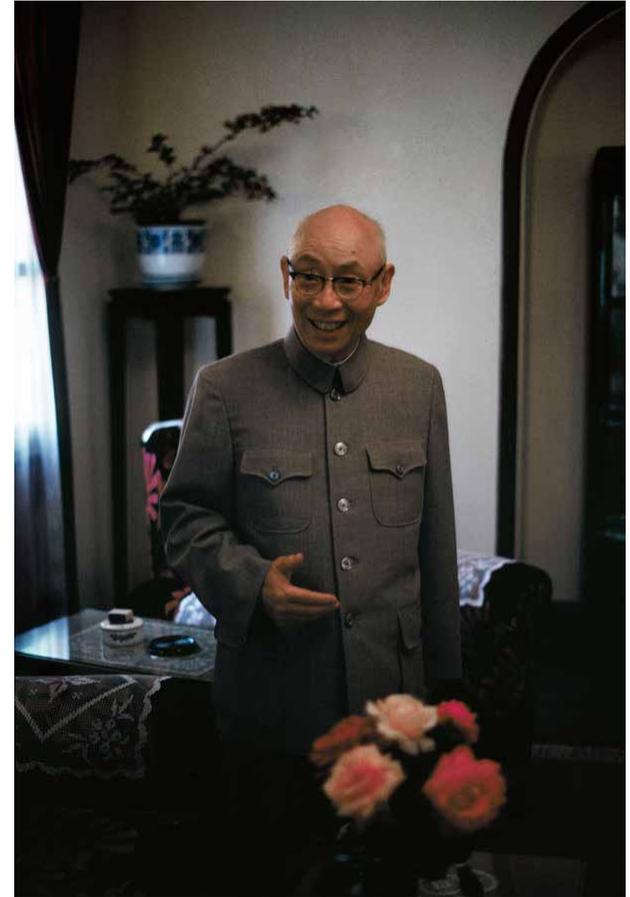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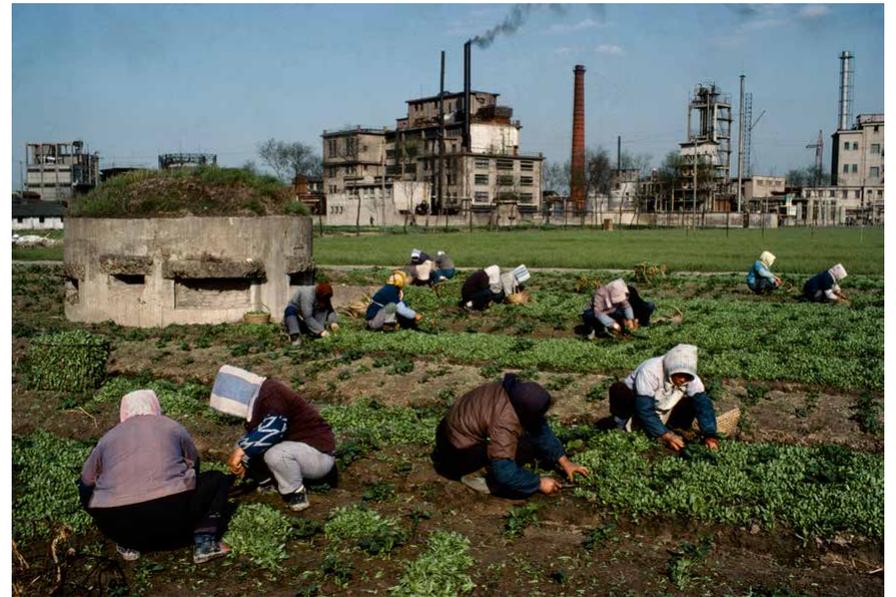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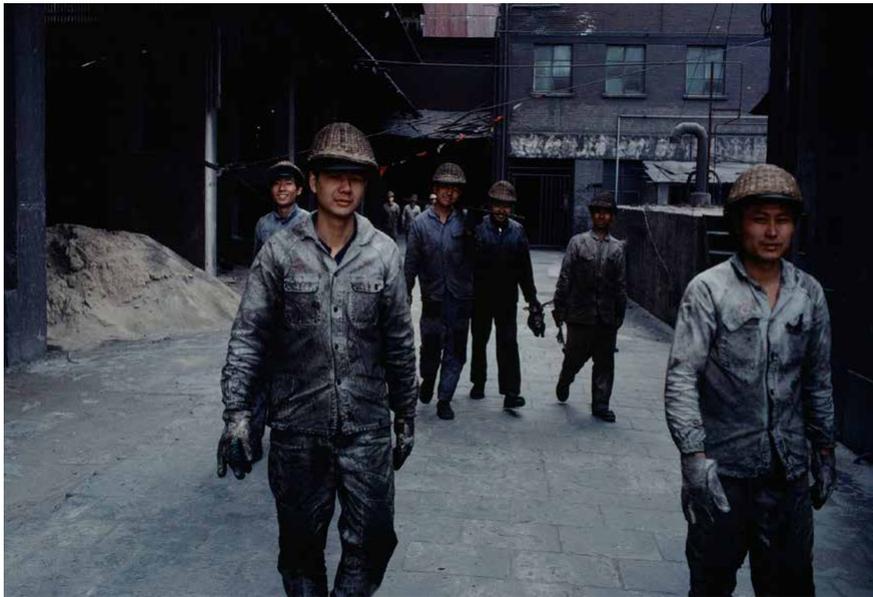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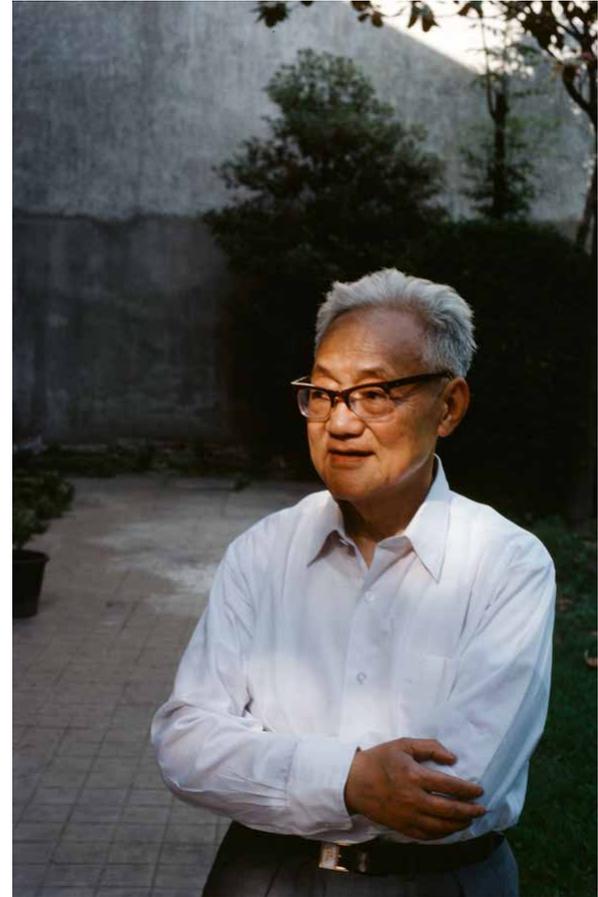












BRUNO BARBEY CHINA IN BLUE  
– SICHUAN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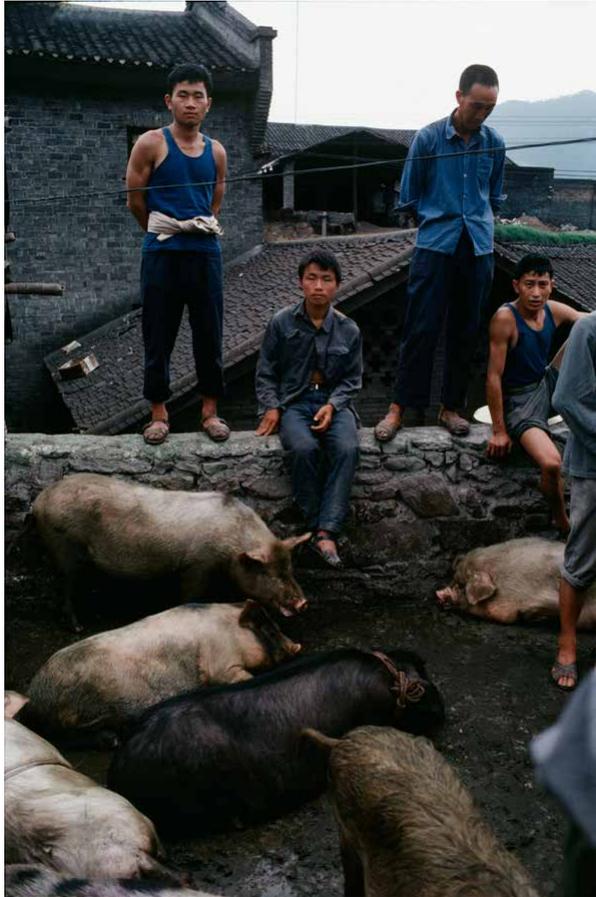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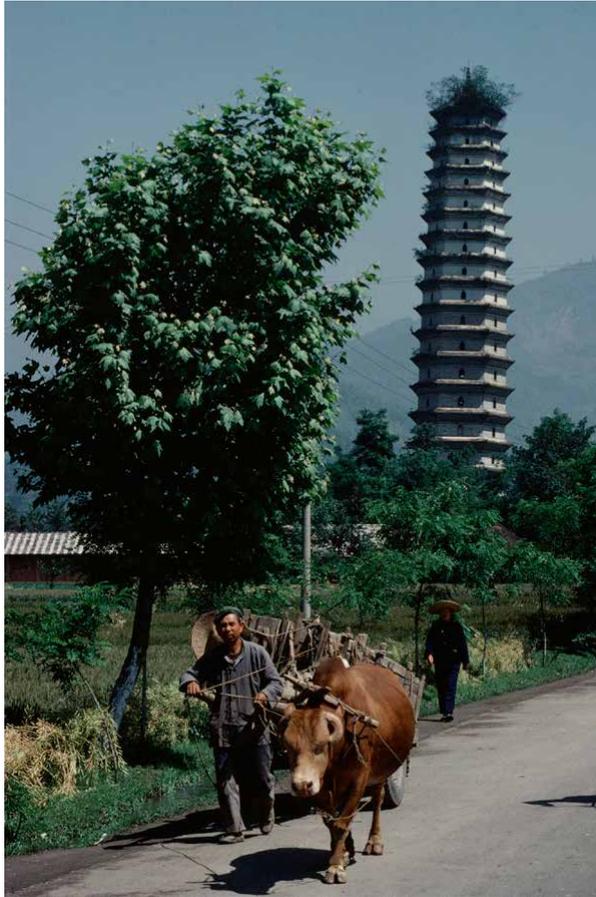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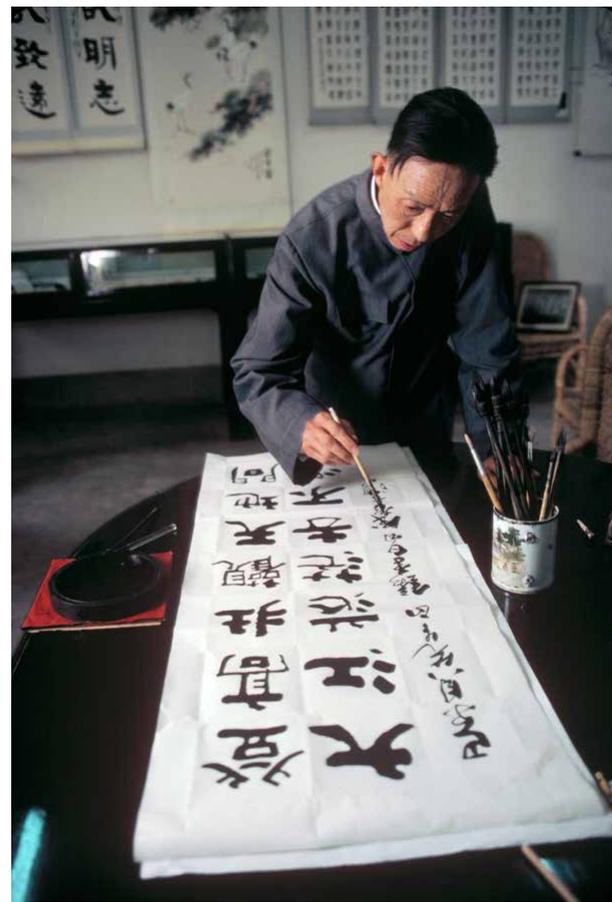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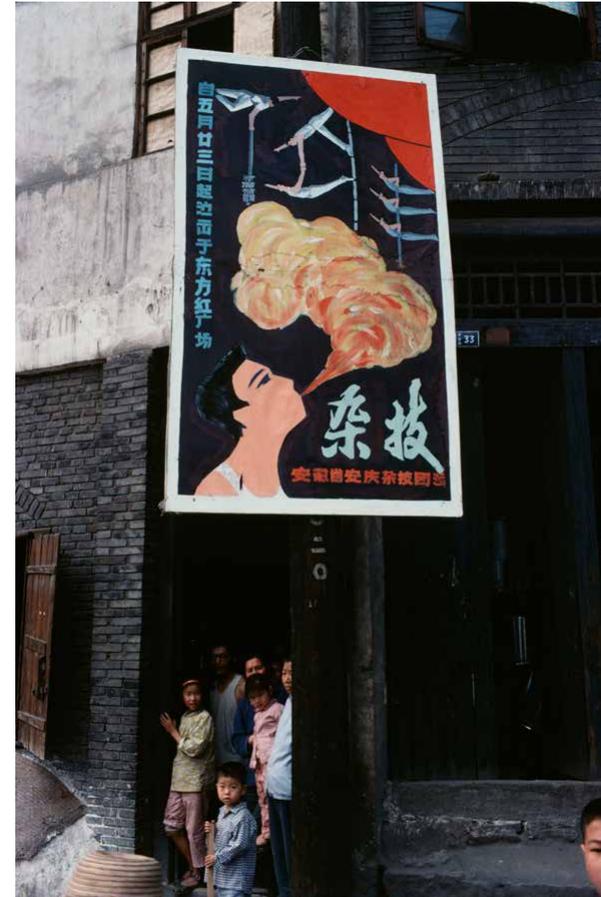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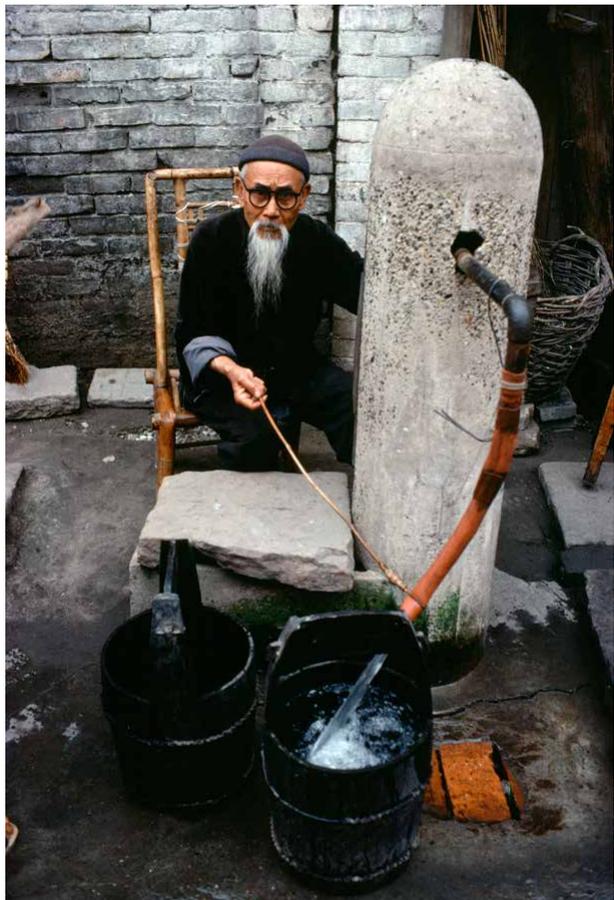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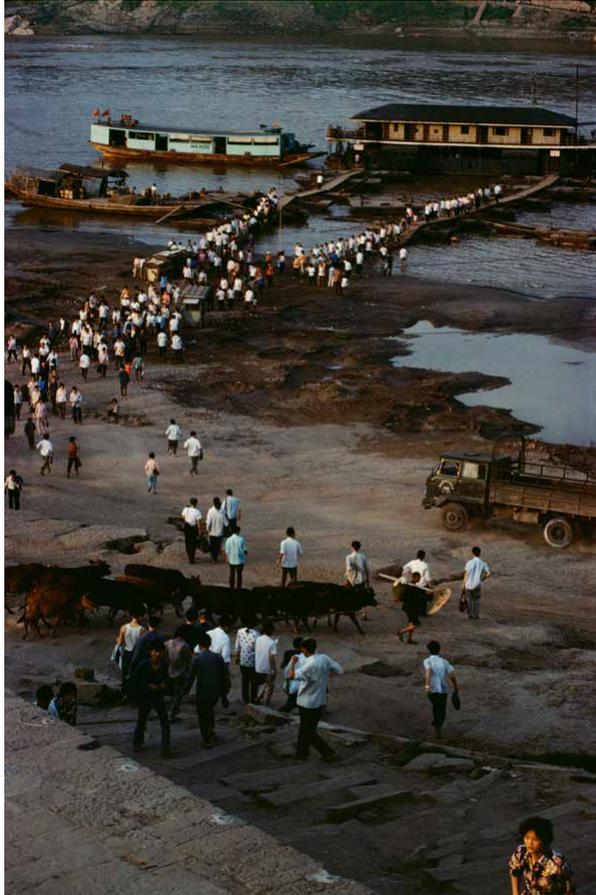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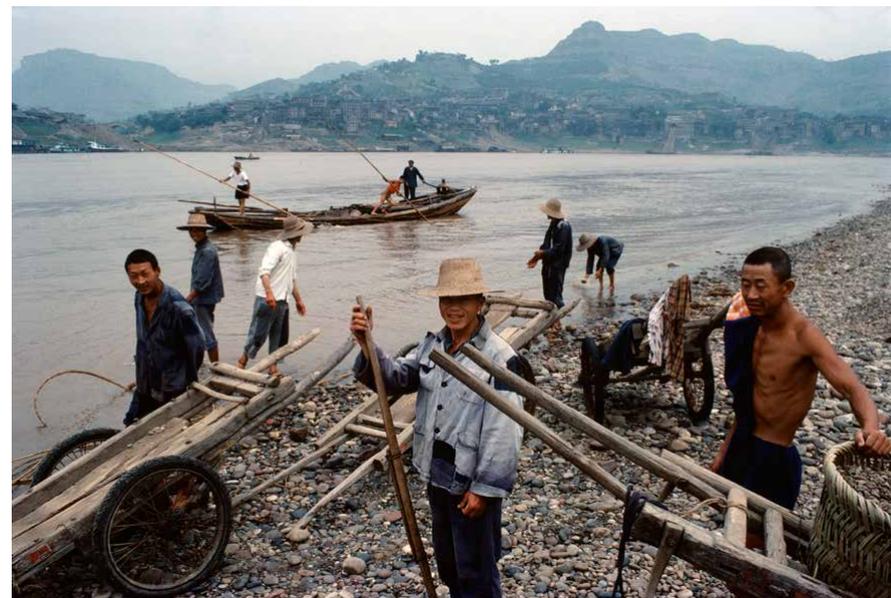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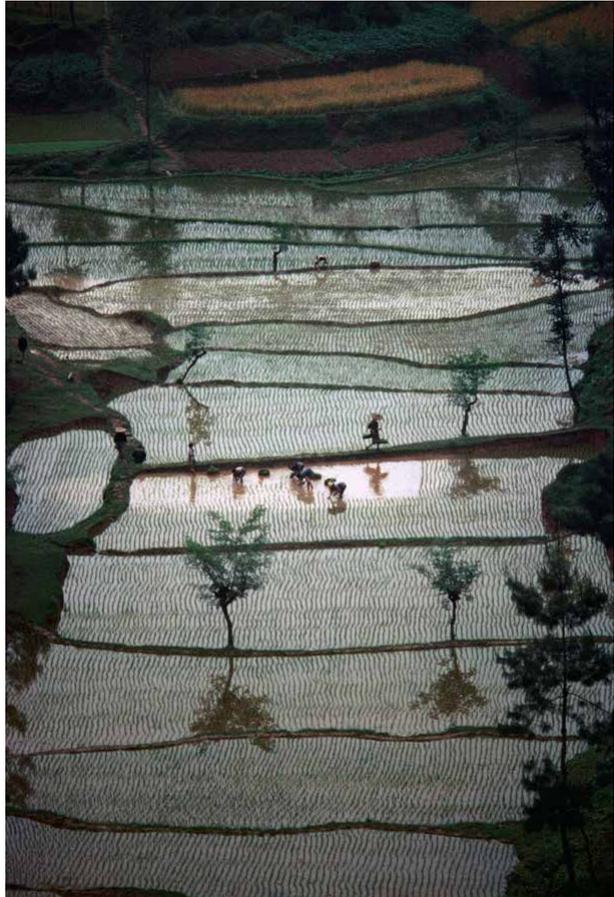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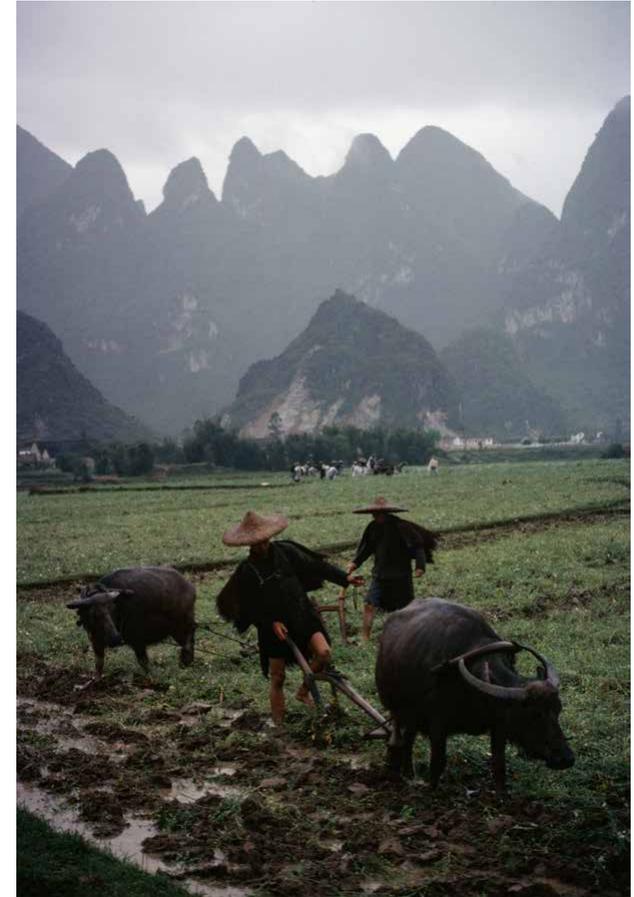






BRUNO BARBEY CHINA IN BLUE  
– GUANGXI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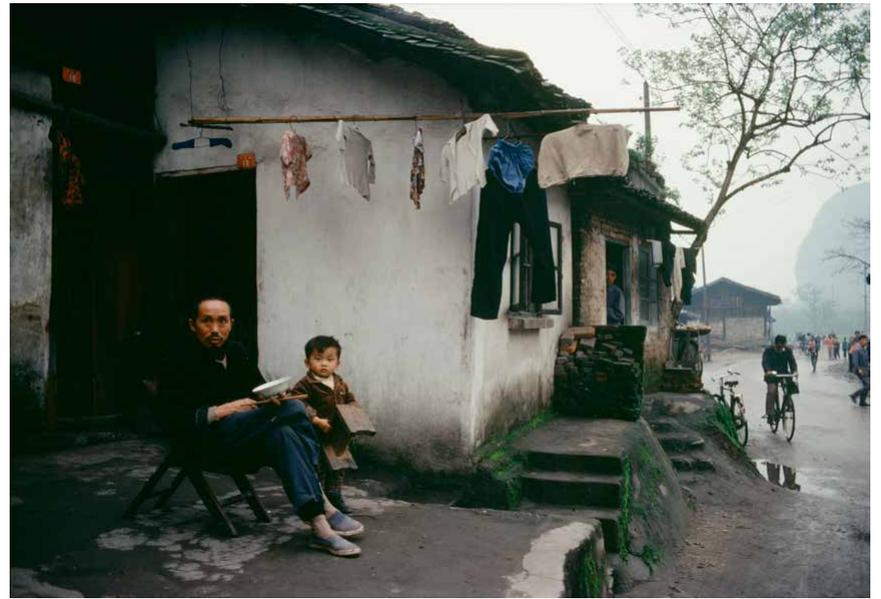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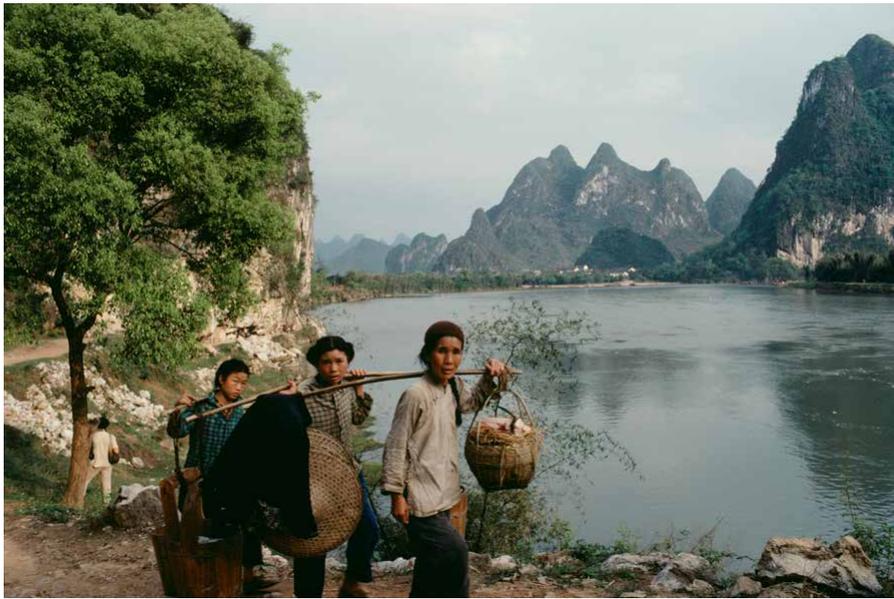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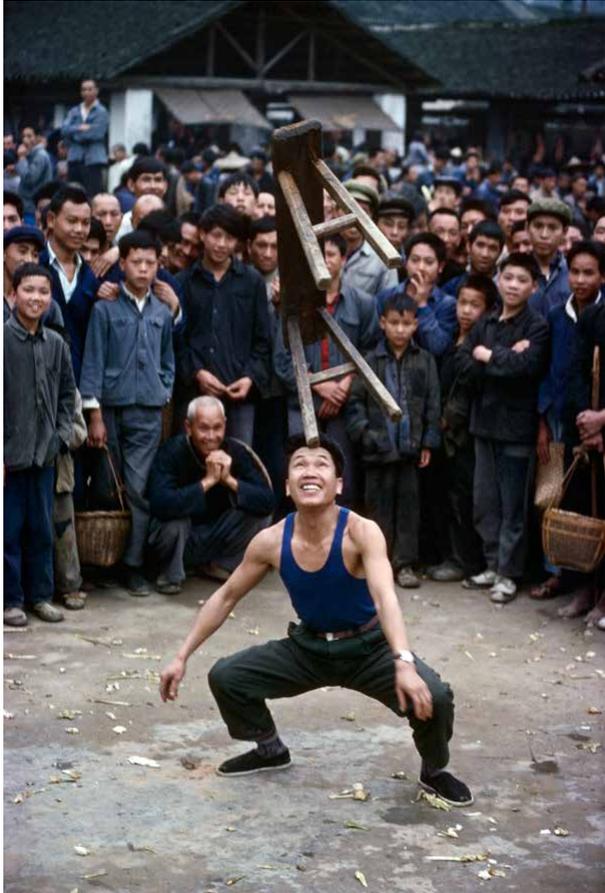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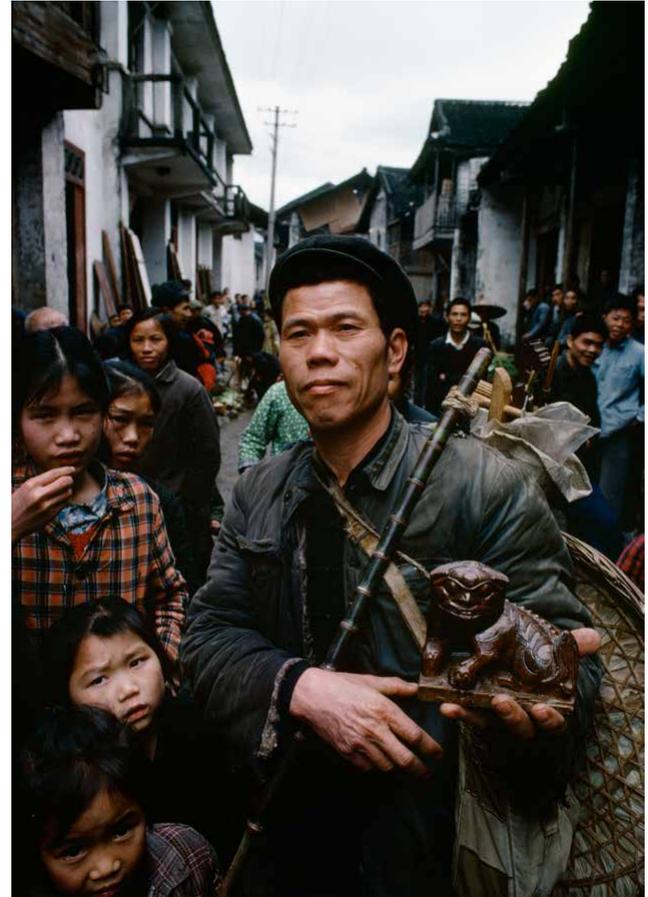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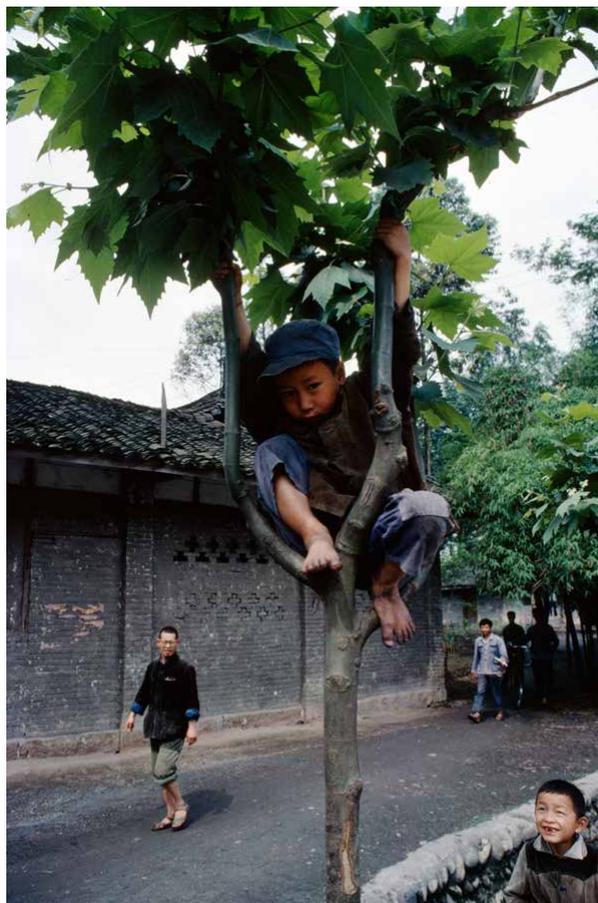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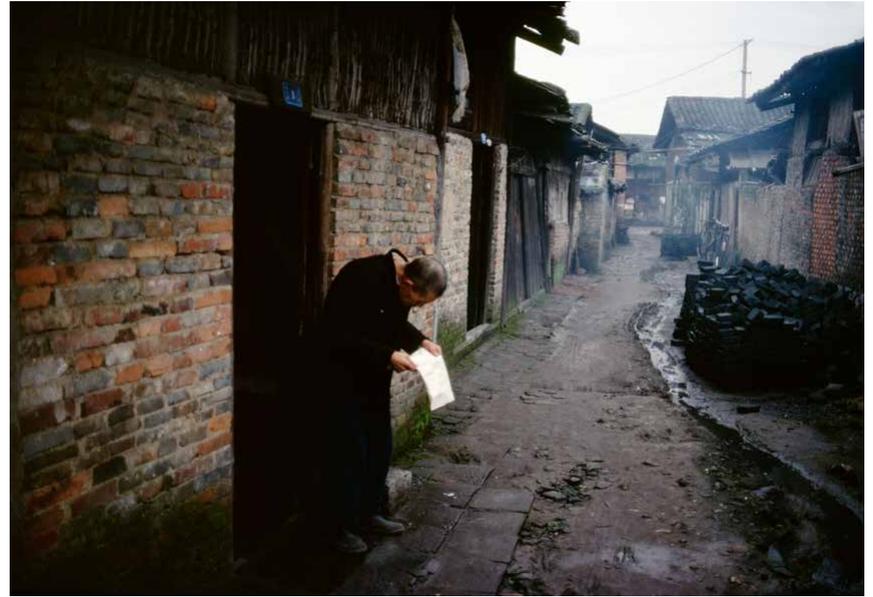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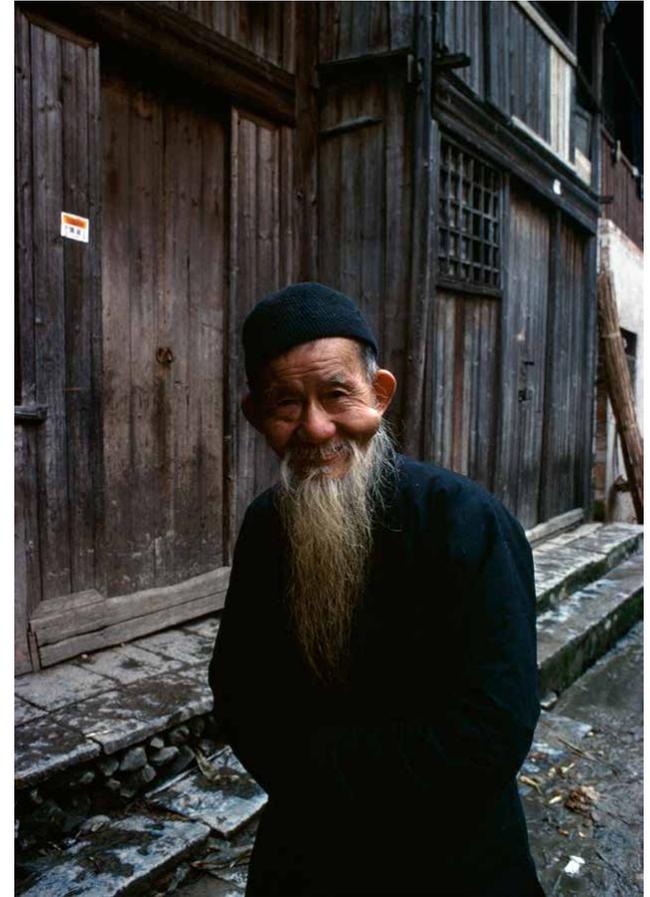




















MACAO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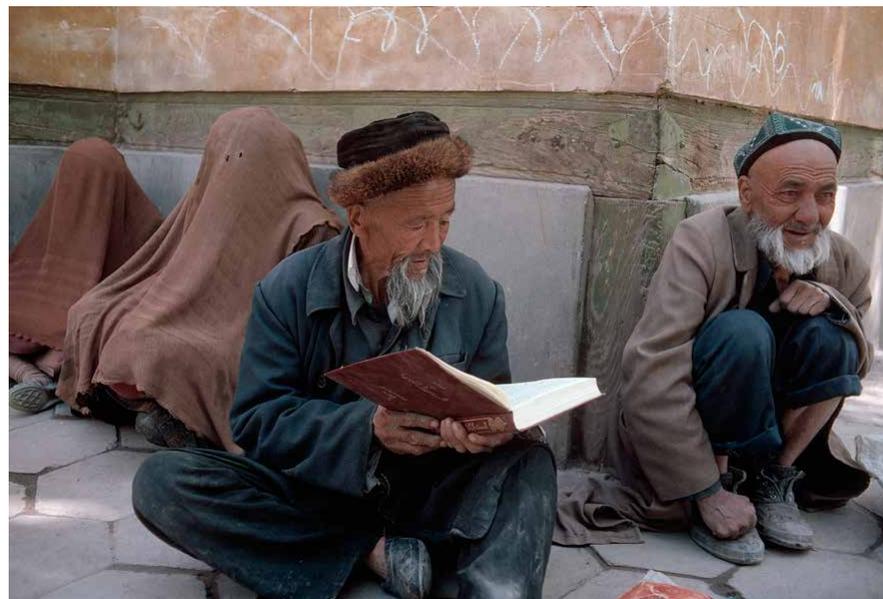




XINJIANG  
1989















## CONTEMPORARY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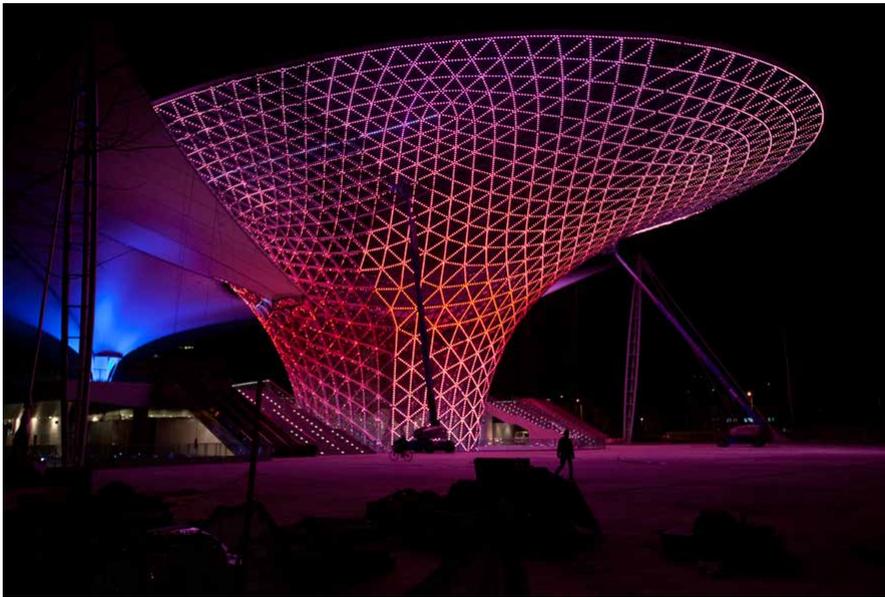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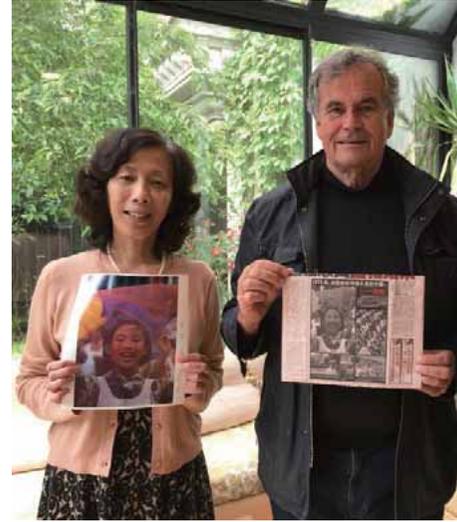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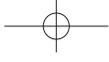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 出版书籍

- 2018年 《在五月风暴的中心》( *Au Coeur de Mai 68* ), 菲利普·泰松 ( Philippe Tesson ) 撰文, 巴黎, Éditions du Pacifique
- 2016年 《布鲁诺·巴贝在路上》, 北京, 后浪出版公司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5年 《布鲁诺·巴贝在路上》( *Passages* ), 巴黎, 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  
《布鲁诺·巴贝》, 阿尔勒, Acte Sud  
《中国,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代》( *China, from Mao to Modernity* ), 巴黎, Éditions Didier Millet
- 2014年 《中国》( *Chine* ), 巴黎, Éditions du Pacifique
- 2012年 《布鲁诺·巴贝》, 伊斯坦布尔, Fotografevi, “FotoCep” 系列  
《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1973—1980》( *China in Kodachrome 1973-1980* ), 华盛顿,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 比极影像画廊
- 2011年 《阿曼 1971》( *Oman 1971* ), 迪拜, The Empty Quarter Gallery
- 2010年 《上海》( *Shanghai* ), 合集
- 2008年 《1968》, 伊斯坦布尔, Fotografevi  
《68》( 附卡罗琳·蒂埃诺-巴贝 [ Caroline Thiénot-Barbey ] 拍摄的 15 分钟纪录片 ), 巴黎, Creaphis, “Foto” 系列



446 巴贝在长城上和翻译导游合影, 北京, 1973 年  
巴贝在黄浦江上, 巴贝夫人卡罗琳摄, 上海, 19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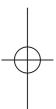




- 2003 年  
 《摩洛哥》( *Maroc* ), 巴黎, 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  
 《我的摩洛哥》( *My Morocco* ), 伦敦, Thames & Hudson  
 《摩洛哥》( *Marokko* ), 慕尼黑, Knesebeck
- 2002 年  
 《意大利人》( *Les Italiens* ), 巴黎, 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  
 《意大利人》( *The Italians* ), 纽约, Abrams
- 2001 年  
 《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巴黎》( *Le Paris de Jean-Paul Sartre et Simone de Beauvoir* ), 让-吕克·莫罗 (Jean-Luc Moreau) 撰文, 巴黎, Éditions du Chêne
- 2000 年  
 《索维拉》( *Essaouira* ), 巴黎, Éditions du Chêne
- 1999 年  
 《布鲁诺·巴贝》, 巴黎, Éditions Nathan, “Photo Poche” 系列
- 1998 年  
 《五月风暴》( *Mai 68* ), 巴黎,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 1997 年  
 《云中之人》( *Gens des Nuages* ), J. M. G. 勒克莱齐奥 ( J. M. G. Le Clézio ) 撰文, 巴黎, Éditions Stock
- 1996 年  
 《非斯, 静止而永恒》( *Fès, immobile, immortelle* ), Éditions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
- 1988 年  
 《葡萄牙》( *Portugal* ), 汉堡, Hoffmann & Campe Verlag
- 1984 年  
 《加蓬》( *Le Gabon* ), 巴黎, Éditions du Chêne

女学生在雨中欢送法国总统, 上海虹桥机场, 1973 年  
 王晓雅 (音) 在巴黎和巴贝相见, 2016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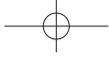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 1982 年      《波兰》( *Pologne* ) , 巴黎, Éditions Arthaud
- 《波兰》( *Poland* ) , 伦敦, Thames & Hudson
- 《波兰》( *Polen* ) , 汉堡, Hoffmann & Campe
- 1979 年      《孟买》( *Bombay* ) , 荷兰, Time & Life Books
- 1978 年      《尼日利亚》( *Nigeria* ) , 巴黎, Éditions Jeune Afrique
- 1976 年      《伊朗》( *Iran* ) , 巴黎, Éditions Jeune Afrique
- 1974 年      《锡兰》( *Ceylan* ) , 巴黎, Éditions André Barret
- 1968 年      《苏格兰》( *Ecosse*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 1967 年      《科威特》( *Koweït*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 1966 年      《肯尼亚》( *Kenya*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 1966 年      《葡萄牙》( *Portugal*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 1964 年      《卡马格》( *Camargue*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 《那不勒斯》( *Naples* ) , 洛桑, Éditions Rencon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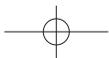
448      李朝 ( 后排左一 ) 在上海少年宫手风琴班, 1980 年  
 李朝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 2016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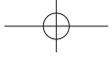




## 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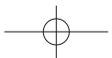
- |        |   |
|--------|---|
| 2019 年 | “在路上”回顾展，青岛市博物馆<br>“摩洛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徕卡画廊  |
| 2018 年 | “在路上”回顾展，深圳美术馆<br>“在五月风暴的中心”，法国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br>“蓝色中国”，土耳其，布尔萨国际摄影节<br>“在五月风暴的中心”，法国巴黎，太平洋出版社美术馆<br>“巴黎五月风暴 50 周年”，上海，比极影像画廊<br>“历史见证者”，加拿大多伦多，斯蒂芬·巴尔杰画廊<br>“五月风暴或想象力夺权”，法国，图尔城堡<br>“扎耶德年”，阿联酋迪拜，The Empty Quarter 画廊<br>“在路上”，德国柏林，维利·勃兰特故居 |
| 2017 年 | “在路上”，德国，法兰克福摄影论坛“法国人眼中的法兰克福”单元<br>“在路上”，上海法语培训中心<br>“布鲁诺·巴贝”，德国法兰克福，徕卡画廊<br>“在路上”，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摄影艺术城市论坛<br>“马格南，第一次”，意大利，布雷西亚博物馆基金会<br>“《生活》与马格南：创造历史的新闻摄影”，意大利克雷莫纳，小提琴博物馆<br>“时空旅行者”，上海国际摄影节  |
| 2016 年 | “在路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br>“阿联酋独立日”，阿联酋迪拜，The Empty Quarter 画廊<br>“马格南大师展：布鲁诺·巴贝和伊恩·贝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
| 2015 年 | “在路上”回顾展，法国巴黎，欧洲摄影之家<br>“多维尔 1966—2015 极速”，法国多维尔<br>“摩洛哥：摄人之美”，沙特阿拉伯吉达，The Empty Quarter 画廊<br>“1973 年以来的中国”，中国香港，F11 摄影博物馆   |
| 2014 年 | “摩洛哥”，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摄影节<br>“摩洛哥：摄人之美”，阿联酋迪拜，The Empty Quarter 画廊   |
| 2013 年 | “摩洛哥”，土耳其布尔萨<br>“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1973—1980”，昆明，云南省博物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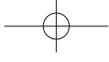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 2012 年 “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1973—1980”，上海，比极影像画廊
- 2011 年 “伊斯坦布尔”，法国滨海萨纳里，地中海摄影节  
“布鲁诺·巴贝的阿曼 1971”，阿曼苏丹国马斯喀特，Bait Al Baranda 博物馆
- 2010 年 “上海世博会”，法国巴黎，Lipao-Huang 画廊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YapiKredi 银行文化艺术传媒公司
- 2009 年 “寻觅之眼”，巴西圣保罗州立美术馆  
“意大利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YapiKredi 银行文化艺术传媒公司
- 2008 年 “布鲁诺·巴贝——我的摩洛哥”，韩国首尔，M 画廊  
“1968 年的巴黎与东京”，德国柏林，维利·勃兰特故居  
“1968 年的巴黎与东京”，西班牙格拉纳达，Cajasol 银行  
“布鲁诺·巴贝眼中的五月风暴”，西班牙科尔多瓦，Vimcours 展厅  
“1968 年的巴黎与东京”，西班牙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Cajasol 银行

450 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和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教授董强，两位也是法兰西学会通信院士，2018 年布鲁诺·巴贝和吴为山、吴小平夫妇，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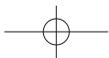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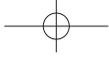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 “五月风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摄影画廊
- “五月风暴”，法国克莱蒙费朗，Fontfreyde 酒店
- “五月风暴”，法国巴黎，太平洋出版社美术馆
- “五月风暴”，捷克布拉格，法兰西学院
- “五月风暴”，法国波尔多，海军基地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马拉喀什，巴迪皇宫
- 2007 年 “摩洛哥全景”，德国波茨坦，艺术馆
- “保加利亚，欧洲视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非斯，Mohamed Kacimi 画廊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得土安，艺术与工艺美术学院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圣心大教堂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丹吉尔，塞万提斯学院
- “摩洛哥印象”，摩洛哥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国家剧院
- “摩洛哥印象”，法国巴黎，太平洋出版社美术馆
- 2006 年 “摩洛哥印象”，西班牙塞维利亚，地中海文化基金会
- “摩洛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伊莎贝尔二世运河公司
- “摩洛哥”，德国柏林，维利·勃兰特故居
- 2005 年 “摩洛哥”，法国皮托，文化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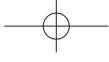
巴贝夫人卡罗琳给农民拍纪录片，身边是当年租用的车子，桂林，1980 年  
 巴贝和阳朔村民合影，巴贝夫人卡罗琳摄，阳朔，1980 年





- 2004 年 “摩洛哥”，法国蒙彼利埃，摄影画廊
- 2003 年 “意大利人”，欧洲多国，FNAC 画廊
- 2002 年 “意大利人”，西班牙萨拉曼卡，Garcigrance 展厅  
“摩洛哥”，比利时布鲁塞尔，植物园
- 2001 年 “布鲁诺·巴贝”，美国旧金山，Singer 画廊
- 1999 年 “非斯”，法国斯特拉斯堡，市政厅  
“布鲁诺·巴贝：摩洛哥”，法国巴黎，小皇宫  
“意大利人”，法国巴黎，欧洲摄影之家  
“非斯”，法国图卢兹，水塔美术馆
- 1998 年 “五月风暴”，法国旺斯，Beaubourg 画廊  
“五月风暴”，意大利米兰，Unita 画廊
- 1997 年 “非斯”，法国，FNAC 画廊  
“非斯”，摩洛哥拉巴特，Mohammed El-Fassi 画廊  
“非斯”，摩洛哥非斯，Batha 博物馆
- 1996 年 “非斯”，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
- 1990 年 “摩洛哥”，法国留尼汪，港口文化中心
- 1985 年 “意大利人”，法国巴黎，马格南图片社画廊
- 1983 年 “波兰”，法国，FNAC 画廊  
“波兰”，意大利罗马，现代艺术博物馆 / 瑞士苏黎世，尼康画廊
- 1982 年 “亚洲写真”，法国巴黎 / 日本东京 / 德国汉堡
- 1978 年 “长路纪行”，法国巴黎，摄影沙龙
- 1972 年 “回顾”，法国巴黎，尼康画廊
- 1967 年 “意大利影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 部分永久收藏

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  
 法国巴黎，巴黎市立美术馆（小皇宫博物馆）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  
 法国巴黎，欧洲摄影之家  
 比利时布鲁塞尔，植物园博物馆  
 日本东京，大都会摄影博物馆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  
 韩国首尔，国家艺术博物馆  
 美国奥斯汀，哈里·兰塞姆中心  
 比利时，Lhoist 艺术收藏  
 法国巴黎，NSM. 人寿 / 荷兰银行艺术收藏  
 法国巴黎，国家现代艺术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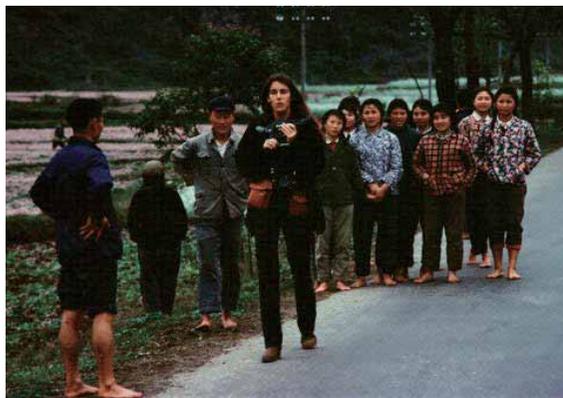
F11 摄影博物馆创始人、馆长苏影德与巴贝在巴贝的“1973 年以来的中国”展览上，香港 F11 摄影博物馆，2015 年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钟维兴和巴贝在巴贝家里，巴黎，2016 年





## 影片

- 2015 年 《永远的摩洛哥》，卡罗琳·蒂埃诺-巴贝，28 分钟
- 《波兰，不可能的信仰》，卡罗琳·蒂埃诺-巴贝，20 分钟
- 《在路上》，卡罗琳·蒂埃诺-巴贝，26 分钟
- 2014 年 《世界末日之科威特》，卡罗琳·蒂埃诺-巴贝，5 分钟
- 2012 年 《柯达克罗姆的中国》，卡罗琳·蒂埃诺-巴贝，18 分钟
- 2008 年 《五月风暴》，卡罗琳·蒂埃诺-巴贝，15 分钟
- 2005 年 《广角》，2M 传媒，摩洛哥
- 2003 年 《摩洛哥全景》，Betacum 录影带，卡罗琳·蒂埃诺-巴贝，12 分钟
- 2002 年 《意大利人》，卡罗琳·蒂埃诺-巴贝，10 分钟
- 1996 年 《摩洛哥无国界》，穆斯塔法·布阿扎维 (Mostafa Bouazzaoui) 为摩洛哥电视台执导
- 1988 年 《摩洛哥报道之行》，《国家地理》百年纪念献礼影片，克莱姆·瓦朗斯 (Clem Vallance) 为英国广播公司执导
- 1979 年 《三天，三位大师》，介绍布鲁诺·巴贝、让卢普·西夫 (Jeanloup Sieff) 与罗伯特·杜瓦诺 (Robert Doisneau) 的影片，费尔南·莫兹克维茨 (F. Moscovitz)
- 1968 年 《五月风暴》，16 毫米黑白胶片



454 巴贝夫人卡罗琳和农民合影，桂林，1980 年  
解放军走过《布鲁诺·巴贝在路上》新书发布宣传画报，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6 年





## 摄影师简介

布鲁诺·巴贝，出生于摩洛哥，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曾在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学习摄影和平面设计。

1961—1964年，他拍摄了“意大利人”系列。他把他们视为“戏剧世界”中的主角们，想要捕捉一个民族的精神。

布鲁诺·巴贝与马格南图片社的关系开始于1964年。他在1978—1979年任马格南欧洲区副主席，1992—1995年任马格南全球主席。

在超过五十年的时间里，布鲁诺·巴贝的足迹遍布五大洲，拍摄过尼日利亚、越南、中东、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北爱尔兰、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他在世界各大杂志发表过作品，出版过三十多本画册。

1999年，巴黎小皇宫博物馆为布鲁诺·巴贝举办大型个展，展出他在摩洛哥拍摄的跨越三十多年的作品。

2015—2016年，巴黎欧洲摄影之家举办他的大型回顾展“在路上”，随后展览在全球各大美术馆、画廊巡回举办。同名回顾摄影集同时出版。

他获得过众多奖项，包括1982年获得的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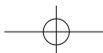
2016年，布鲁诺·巴贝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展出，被多家美术馆收藏。

现在他致力于一个新项目，并在中国广泛拍摄。



巴贝当选法兰西艺术院终身院士，身边是他的夫人卡罗琳，巴黎，2018年4月 455





## 致谢

Caroline Thiénot-Barbey, Aurélie Barbey, Igor Barbey, Margot Becka,  
Didier Bernheim, Stephen Bulger, Jean-François Camp,  
Gölnur Cengiz, Yan Chen, Dong Qiang, Elliott Er Witt, Gao Bo,  
Gao Jian, Helen Chen, Cheng Jiwei, Sonja Kruchen, Hiroji Kubota,  
Hervé Le Goff, Liu Heung Shing, Serge Lipao, Jean Loh,  
Steve McCurry, Enrico Mochi, Jean-Luc Monterosso, Carrie Ng,  
Giulietta Palumbo, Alain-Charles Perrot, Hasan Senyuksel,  
Shang Da, Karen Smith, Douglas So, Sun Chengyi, Ana Tamayo,  
Jean-Baptiste Thiénot, Wu Weishan, Esther Woerdehoff, Sarah Wu,  
Wu Xingyuan (From Post Wave), Zhong Weixing

